傳世鈞窯器的時代問題

羅慧琪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前言

1975年鈞台窯址發掘報告的出版在鈞窯研究的長流中激起強烈的波濤，①一時之間種種「結論式」之論點紛起。鈞窯在地位上被提升至官窯產品，與汝官窯之細緻品格同爲北宋人高雅品味之寵兒。不但年代向前邁一大步，還被歸納成上繫唐代花瓷的宋代六大窯系之一。②

由此觀之，窯址發掘似被視爲一切難題之解答、及時的甘霖。然而，縱觀鈞窯研究史之整體，並參考鈞台窯出土物，似乎隱約可察覺到：鈞台窯報告本身似籠罩在當時學界對鈞瓷既有之概念下，以既成之觀念解釋本應完全中立之考古出土物。該報告進而變成了「鈞窯爲北宋官窯」說法的臨門一腳，企圖將自清代以來的學說帶上高峰，並畫下句點。在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重新檢討研究史，雖然應對當時的研究環境及面對「新發現」的興奮之情有所體諒，但是亦應冷靜地思考各研究之盲點，以期對鈞窯有更眞實的瞭解。

「時代」問題一直是鈞窯研究困境之核心。不論企圖將之與九世紀唐代花瓷、傳說中的柴窯、或與汝瓷相銜接以廓清其來龍去脈，鈞窯確切開窯時點之不明使得這三種假說難以檢驗。另外，其延續時代的模糊曖昧亦使得稍晚之文獻記錄變得難以相信。再加上有一批從未有過墓葬出土記錄的傳世鈞窯

本文爲作者碩士論文的一部分（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1996年6月），學習及寫作期間承蒙指導教授謝明良先生耐心地教導，特此致上由衷的感謝。然文中若有任何疏失錯誤，完全是作者本身的責任。

① 趙青雲，〈河南省禹縣鈞台窯的發掘〉，《文物》，1975年6期，頁57-63。

② 馮先銘，〈宋代瓷器發展的幾個問題〉，《中國古陶瓷論文集》（香港：兩木，1987），頁285-290。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器③被賦予北宋官窯之名，以此作爲其開窯時代的標的，使問題更加複雜化。

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釐清傳世鈞窯的時代問題。因其不論在胎釉特徵、用途、出土狀況等都與一般墓葬中可見之日用型鈞瓷大相逕庭，故在概念上必須先有所區分。這一群傳世鈞窯器以往的研究傾向多與文獻中北宋徽宗的艮嶽相提並論，被認爲是屬於北宋官窯的一種。本文首先將回顧研究史，其次檢驗鈞台窯的狀況，再經由器形、胎、釉之比對考察傳世鈞窯的可能時代。

一、研究史及其問題點

廣義而言，鈞窯的研究在中國自明朝開始，日本、歐美之研究都在二十世紀揭幕。本節擬以二十世紀的二〇年代爲分水嶺，討論此三方的研究動向。

1. 中國文人式的鑑賞

儻若不考慮「方志」之類對河南禹縣產瓷的簡短記載，④眞正視鈞瓷爲討論之對象且直接予以描寫的紀年記錄應以明萬曆十九年（1591）高濂之《燕閒清賞》⑤爲最早，對後來其它關於鈞窯的看法留下深深的影響。⑥

③ 本文中「傳世鈞窯器」指鈞窯出脊尊、蓮式、海棠式、方形、六角形、圓形花盆及承盤等鈞瓷陳設器，即西方學者所謂之"NUMBERED CHUN WARES"。此類鈞瓷底部多刻、印漢文數字，至今未曾自墓葬或窖藏出土。另一類鈞瓷器形包括碗盤瓶杯爐等，常見於墓葬、窖藏及居住遺址，本文概稱爲日用型鈞瓷。

④ 如明朝天順（1457-1463）時《大明一統志》：「開封府土產瓷器鐵俱鈞州出。」見李賢，《大明一統志》（台北：文海，1965），冊4，卷26，頁1812。

⑤ 高濂，〈燕閒清賞〉，上，《遵生八牋》，卷14，收在《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冊871，頁713-714。

⑥ 差不多同時代的項元汴雖有《歷代名瓷圖譜》傳世（收在《說陶》，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頁929-1091），然而由其圖譜判斷，所刊之部分瓷器器形明顯屬清代之產物，故此書年代不可能早於《遵生八牋》；其亦反映晚明至清文人對鈞瓷認識之疏略。另外，郭葆昌亦曾推論此書非項氏之作。例如其爲《歷代名瓷圖譜》圖22「宋汝小圓觚」之解說：「...余見於吳門申文定公家。」所作之註曾提及：「...申時行之卒後於項氏二十四年。項書不能先著其證。此必出項氏子孫臨移者所爲。其時已在申卒之後。」見《說陶》，頁975。

明朝提及鈞瓷的文獻大多屬於「文房清賞載錄」的性質。由於此類書籍意在品評，所以可顯示鈞窯器在當時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在開始討論晚明鑑賞性文獻之前，必須先提及《大明會典》中的二則敘述。在《大明會典》中曾錄：

「宣德間題准。光祿寺每年缸罈瓶。共該五萬一千八百五十隻箇。分派河南布政司鈞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隻。十瓶罈八千五百二十六箇。七瓶罈一萬一千六百箇。五瓶罈一萬一千六百六十六箇。酒瓶二千六十六箇。眞定府曲陽縣。酒缸一百一十七隻。十瓶罈四千二百七十四箇。七瓶罈六千一百箇。五瓶罈六千二百四十箇。酒瓶一千三十四箇。每年燒造解寺應用。」⑦

及

「嘉靖三十二年題准通行折價。每缸一隻折銀二錢。瓶罈一箇折銀一分。鈞州缸一百六十隻。瓶罈一萬八千九十箇。共該銀二百一十二兩九錢。外增腳價銀一百九十七兩一錢。又大户幫貼銀六十兩。…曲陽縣缸瓶罈共一萬七千七百六十五件…通行解部。召商代買。如遇缺乏。止行磁州。眞定燒造。免派鈞州。四十二年奏准。鈞州腳價幫貼。盡行除豁。」⑧

二則。其中有許多難解之處，例如何謂五瓶罈、十瓶罈？是否可視爲裝置五瓶、十瓶大小容量的「罈甕」？這種稱呼方式在何時流行？其是否亦在容器器身留下數目字以代表大小？等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自宣德至嘉靖年間，鈞窯窯場似乎並不冷清（在《大明會典》這種官方文件中提及，似亦可爲此現象提供說明。），以燒製瓶罐等日用器爲主。

另外，作於宣德年間的《宣德鼎彝譜》曾記宣德三年（1428）時，皇上因陳設鼎彝式範鄙陋，欲鑄鼎彝以供郊壇太廟內廷之用，故下諭：

「款式巨細。悉仿宣和博古圖錄。及考古諸書。並內庫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窯器皿款式典雅者。寫圖進呈揀選。依原樣勒限鑄成。」⑨

依瓷器式樣製鑄銅器的做法與古代陶瓷仿青銅器剛好相反，頗饒趣味。然而觀此書所錄鑄成之器，全爲鼎、爐之類。縱觀今日遺存之鈞瓷，爐類只有三足爐、鼎式爐與圈足帶雙耳爐三類，而且其釉爲墓葬中可見鈞瓷的釉，

⑦ 申時行等修，《大明會典》，明萬曆十五年大黑口刊本，卷194，頁2-3。

⑧ 同註⑦，頁3-4。

⑨ 呂震，《宣德鼎彝譜》，卷1，收在《叢書集成新編》（台北：新文豐，無出版年月），冊50，頁44。

臺灣大學提供 期刊資料庫

足見當時宮廷亦使用日用型鈞瓷。

約一百五十年之後，高濂很清楚地告訴讀者他對鈞瓷的主觀意見：

「均州窯有珠砂紅、蔥翠青（俗謂鶯哥綠）、茄皮紫；紅若膩脂，青若蔥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純無少變露者爲上品，底有一二數目字號爲記。豬肝色、火裡紅、青綠錯襍若垂涎，色皆上三色之燒不足者，非別有此色樣，俗即取作鼻涕涎、豬乾等名，是可笑耳。此窯惟種蒲盆底佳甚，其它如坐墩、爐、盒、方瓶、雄子俱以黃沙泥爲坏，故器質粗厚不佳，雜物人多不尚。近年新燒此窯，皆以宜興沙土爲骨，渰水微似，製有佳者，但不耐用，俱無足取。」⑩

根據其描寫，讀者可以清晰地認知高濂所稱「上品」是指傳世鈞窯器（Numbered Chun Wares）。在高氏眼中，當時鈞瓷陳設器遠佳於爐、盒等日用器。在〈筆洗〉一則內，討論完各窯各式洗後，他說：

「近人多以洗爲杯，孰知厚、捲口而區淺者洗也，豈杯有此製。…諸窯假均州紫綠二色洗與水中丞多甚，製亦可觀，俱不入格。」⑪

此處之二色洗應指傳世鈞窯器中的承盤。由以上二則可想見，當時鈞瓷陳設器必廣受喜愛，致使各地皆群起燒製同型器類。或許此與晚明新興的園林藝術，以及文人雅士喜好書桌清供有關。

雖然如此，鈞窯在晚明文人心中的地位並未能與汝窯相提並論。以〈燕閒清賞〉爲首的晚明記載，論窯器總以「柴汝官哥」開始，鈞窯地位遠不及此四者。《留留青》甚至批評鈞瓷：

⑩ 高濂，《遵生八牋》，頁713-714。標點爲作者所加。

⑪ 高濂，《遵生八牋》，頁751-752。標點爲作者所加。在〈水中丞〉項他也提到：「近有新燒均窯俱法此式，奈不堪用。」同書，頁752。另外，屠隆的《考槃余事》可見與〈水中丞〉項完全相同的句子，參閱《考槃余事及其它三種》（台北：商務書局，1937），頁77。

⑫ 見田藝衡，《留青日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758。根據田氏自序，此書作於隆慶六年（1572）。1992年的此版是據謝國禎家藏1609年重刻本與1584年本校對後所印，其中並未提到鈞窯。鈞窯之相關敘述只出現在萬曆四十二年（1614）喬時敏節錄《留青日札》六卷而成的《留留青》，其中「多失本義，亦有補充」，故此段應爲萬曆末年所增。見謝國禎，〈後記〉，《留青日札》，頁760。

「鈞州稍具諸色，光彩太露，器極大。」⑫

而且鈞瓷總被歸於次級的地位，只屬彭、建、龍、鈞之群。⑬有趣的是，當時文人對龍泉與鈞窯之高下仍未有定論，〈燕閒清賞〉中鈞窯列於龍泉、章窯、古瓷窯、大食窯、吉州窯、建窯之後，而作於四年後（1595）的《清秘藏》則認爲：

「均州窯紅若膩脂者爲最，青若蔥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純而底有一二數目字號者佳，其雜色者無足取。均州窯之下有龍泉窯…」⑭

與《清秘藏》採相同論點的還有傳董其昌撰之《筠軒清閟錄》。⑮中國古代的文人向來對「高古」的事物懷有莫名的崇拜，明晚期文人對古物更充滿狂熱。假設早在北宋時，傳世鈞瓷之器格已與汝瓷同受宋徽宗這位品味高尚的書畫家所肯定，並御令官窯燒製，爲何崇古的晚明文人未曾給鈞瓷如汝瓷般的高評價？⑯

入清之後，鈞窯的文獻亦幾乎無一不抄襲晚明時高濂的紀錄，而且是一

⑬ 田藝衡，《留青日札》，頁759。

⑭ 張應文，《清秘藏》，卷上，1595年，收在《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72，頁8。

⑮ 董其昌，《筠軒清閟錄》，收在《叢書集成新編》，冊50，頁301。然而此書用字遣詞與《清秘藏》如出一轍，應爲抄襲。不只此例，如前所載，明末清賞類的書籍內容多有雷同。明代晚期文人擅以對古物品評、區別雅俗來彰顯各人品味，企圖完成社會身份之辨識。然而各種品評類著作間雜亂的抄襲現象又該如何解釋？其是否意味文人小圈體間的文化認同呢？有關明末文人對「物」的看法請參閱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Oxford: Polity Press, 1991)。Clunas 並未成功地解決明代文人階級間如何在"文化相似性"甚高的狀況下，達成「身份辨識」之問題。參見王淑津評SUPERFLUOUS THINGS，台大藝研所藝術史研究實習課程期末報告。

⑯ 明代其它鈞瓷文獻還有如文震亨在《長物志》「花瓶」項中簡略提及的：「龍泉均州瓶有極大高二三尺者，以插古梅最相稱。」（《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72，頁69。）和方以智，《通雅》所說的：「均州有五色，即汝窯一類也。窯變則時有之，報國寺觀音窯變也。」（《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57，頁642。）方以智在當時已觸及今天衆陶瓷學者感興趣的議題：鈞窯與汝窯的關係。可惜句後將報國寺觀音的景德鎮窯變與鈞窯窯變相混，令人懷疑他對陶瓷熟悉的程度。參見吳允嘉，《浮梁陶政志》，收在《陶瓷譜錄》，上（台北：世界書局，1988），頁54，窯變觀音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字不漏的抄。⑰值得一提的是：鈞瓷的地位有被提升開始與「柴汝官哥」平起平坐的傾向，年代也拉早至北宋。首先，清初孫承澤（1592-1677）在《硯山齋雜記》中論窯器，劈頭就寫道：

「窯器所傳柴汝官哥均定可勿論矣！」⑱

又錄〈高江村酬蒼林宋均窯瓶歌〉。此歌自柴窯、汝窯開始，提及南宋官窯，繼而描述鈞窯雙耳瓶，暗示鈞瓷與官窯的連繫。歌曰：

「…僧僚偶見雙耳瓶，黛色濃淡光冷冷，異哉均州舊時造，幾經兵燹猶完形，蒼公爲言出內府，亂離遺棄等塵土，當今所寶惟蒸民，焚裘裂錦輕圖譜，不爾搜求焉得存，此物早同簠簋尊。」⑲

並批註：

「宣和間內府尚古器，搜求民間無敢隱者。」⑳

認爲此鈞窯雙耳瓶是北宋內府器物。接著，《南窯筆記》（可能刻於清乾隆1736-1795初期）更進一步強調：

「官窯：柴汝官哥定龍泉宣成嘉萬爲宋明十大窯，蓋以諸器畢製命官監督者，其均窯廠官不在大窯之內。」㉑

暗示鈞窯亦有專「官」督造，只是此官不駐在鈞窯。更有甚者，承盤、花盆等也無由地被冠以「北宋鈞州所造」之標簽。㉒此後，1774年的《陶說》即使用「官鈞」一詞，㉓而1815年的《景德鎮陶錄》則強說鈞窯爲「宋初所

⑰ 諸如谷應泰，《博物要覽》，收在《叢書集成新編》，冊50，頁364；朱琰，《陶說》，收在《陶瓷譜錄》，上，頁165；唐秉鈞，《文房肆考圖說》，收在《說陶》，頁788，791；梁同書，《古窯器考》，《陶瓷譜錄》，上，頁8-9，15；張金鑑，《考古偶編》，《說陶》，頁272-273。

⑱ 孫承澤，《硯山齋雜記》，卷4，收在《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72，頁191。程哲聖跋著之《窯器說》有一大半抄襲此書。見《陶瓷譜錄》，上，頁281-291。

⑲ 孫承澤，《硯山齋雜記》，卷4，收在《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72，頁194。

⑳ 同註⑲。

㉑ 佚名，《南窯筆記》，收在《陶瓷譜錄》，上，頁41-42。

㉒ 佚名，《南窯筆記》，《陶瓷譜錄》，上，頁35。

㉓ 朱琰，《陶說》，《陶瓷譜錄》，上，頁178。

燒」，而且景德鎮宋末就開始仿宋初鈞器。㉔由以上的文獻整理可得知，自晚明至清，鈞窯在鑑賞者眼中的地位不斷上昇。

步入廿世紀，外國勢力進入古董交易市場，使鈞瓷或仿鈞的價格高漲，㉕正因古董交易熱絡，各式鑑定的行話紛出籠，產生了「曲鱔走泥紋」㉖、「蚓紋淚痕」㉗等辭彙。雖然抄襲古書的風氣仍盛，㉘對鈞窯的認識卻稍有進步，開始意識到元鈞之存在，並嘗試區分二者。㉙不過，可惜的是卻因此種下往後將鈞瓷佳者定爲宋代，鄙者定爲元代作品之陋因，並因而將較細緻的「均瓷」直接稱爲「宋鈞」，而將稍粗糙者稱爲「元瓷」。㉚

這時候觀念上的另一個更新是鼓吹天青色鈞瓷之深妙，揚棄古來專重

㉑ 藍蒲，《景德鎮陶錄》，見《陶瓷譜錄》，上，頁385，319。

㉕ 如江浦寂園叟提到：「余初著書時。宋均且不見重於西商。今則宋元瓷品。聲價陡增。然猶必沾沾於紫釉。猶未得天青之三昧也。」（《陶雅》，1910年，收在《陶瓷譜錄》，頁387。）；「日本頗貴重廣窯。目爲泥均。價或逾眞均。亦可詫也。」（《陶雅》，《陶瓷譜錄》，頁264。）此外，劉子芬的《竹園陶說》曾述：「…近日商人則重紫，均窯紫器一枚價萬金，…」（見《竹園陶說》，收入《陶瓷譜錄》，下，頁429。）黃濬也說：「光緒初葉，樂亭劉氏極豪奢，飼貓犬飯盆，悉用鈞窯，取其質厚不易損，海王村商人以賤值得之者。彼時內府鈞窯花盆內，亦不過種三文一棵之六月菊，絕無寶貴意。曾不二十年，以歐人最重此瓷，騰漲至萬金以上，識者云更二十年，鈞窯恐將絕跡國中矣。」見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台北：聯經，1979），頁1062。

㉖ 江浦寂園叟，《陶雅》，收在《陶瓷譜錄》，頁263。

㉗ 荊子久，《鈞窯考證》，1936年，收在《說陶》，頁776。

㉘ 如孫鳳翔，《瓷錄》，1915年，收在《陶說》，頁146；鄧蟄民，《增補古今瓷器源流考》，1931年，收在《說陶》，頁442；吳仁敬、辛安潮，《中國陶瓷史》（台北：商務，1937），頁40；趙汝珍，《古玩指南》，1942年，（北京：新華，1989），頁3-4等，都出現前述高濂對鈞瓷的評論。

㉙ 江浦寂園叟，《陶雅》，收在《陶瓷譜錄》，頁387：「宋鈞塗滿紫釉，元則於青釉中夾以紫色一二片，以成魚形者爲佳。」

㉚ 最早將其如此稱呼的是民國初年許之衡的《飲流齋說瓷》：「均窯與元瓷甄易相混，然實大有別也。均釉厚而勻，元瓷釉厚而垂；均之胎釉皆細，元瓷之胎釉皆粗；均之釉無論深淺濃淡皆混然一律，元瓷之釉濃處有時或起條紋，淺處有時仍見水浪，」收在《陶瓷譜錄》，下，頁79。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期刊資料庫

紅、綠、紫的偏好。更或將之與傳說中的柴窯相繫。㉛然而這一切都未能涉及考古實證。

2. 歐美、日本及中國學者的研究

A. 1920--1940

廿世紀初當歐、日學者始加入鈞窯研究行列時，大抵仍服膺中國古文獻，無甚創見。㉜加上語言的隔閡使文獻誤用的機率增多，㉝更使之無甚可取。然而 1920年代以後開始別有一番氣象。最受囑目的是Hobson在1925年爲Eumorfopolous所藏陶瓷作的目錄。㉞這是針對大批鈞窯實物觀察比較，進而分類的鈞瓷專論。他區分所有鈞瓷藏品爲：官窯（特別精緻的日用型鈞瓷）、瓷胎鈞器（鈞瓷陳設器）、沙胎宋鈞（一般日用型鈞瓷）、沙胎元鈞（較粗糙者）、及馬鈞（Soft Chun）五群。㉟雖然今天看來，其沙胎鈞瓷時代辨別標準

㉛ 江浦寂園叟，《陶雅》：「…其實紫釉之乾澀而無蚯蚓走泥紋者，逮不及月白瑩潤者也。月白而能瑩潤，仿柴之雨過天青者也。」（收在《陶瓷譜錄》，頁297。）荊子久則極力辯解，說柴窯的「雨過天晴」色是指雨後天際五彩的雲霞，即鈞瓷器上可見之斑斕彩色。《鈞窯考證》，收在《說陶》，頁 770-772。

㉜ 諸如A. W. Bahr, *OLD CHINESE PORCELAIN AND WORKS OF ART IN CHINA* (London: Casell and Company Limited, 1911); Rose Sickler Williams, *CHINESE, COREAN AND JAPANESE POTTERIES* (N.Y.: Japan Society, 1914); Emil Hannover, *POTTERY AND PORCELAIN: A HANDBOOK FOR COLLECTORS* (N.Y.: Charles Scribuers' Sons', 1925); 大西林五郎，《鑑定備本支那陶磁全書》（東京：中央出版社，1929）；上田恭輔，《支那陶磁雜談》（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20）；渡邊素舟，《支那陶磁器史》（東京：中央出版社，1929）。

㉝ 如上田恭輔將「諱神宗之名故改鈞州爲禹州」記錄中的明神宗誤認爲宋神宗，並導出結論說北宋燒造鈞瓷恐在宋神宗之後。見《支那古陶磁研究の手引》（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37），頁197。

㉞ R. L. Hobson, *THE GEORGE EUMORFOPOULOU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REAN AND PERSIAN POTTERY AND PORCELAINS* (London: Ernest Benn. Ltd., 1925).

㉟ 其實在1914年Hobson已做過類似的嘗試，被稱爲「官窯」的鈞瓷，辨識的基準爲：圈足內有上釉。見R. L. Hobson, "Prefatory Note," *CHINESE, COREAN AND JAPANESE POTTERIES* (N.Y.: Japan Society, 1914), pp. 61-84.

不清、陳設器與日用器胎質的不同也被過份簡單化成瓷胎、沙胎；尤有甚者，將廣東地區仿鈞冠上市肆俗名「馬鈞」之稱，㊱又將馬鈞與清末北京仿製的「軟鈞」（Soft Chun）混爲一談。㊲但Hobson首採之分類方法的確理出些頭緒，而且影響西方對鈞瓷看法甚巨。此後至1960年代討論鈞瓷的大部分英文論文，都不免跟隨Hobson氏，將石灣窯仿鈞算入，歸爲Soft Chun 群㊳。（唯一的不同在於1950年代多了「綠鈞」這個範疇。）㊴

相對於歐陸的科學實證取向，日人的想法顯然有較多的傳統涵養及既定品味爲背景。久志卓眞首先懷著日本人特有對於「宋磁」之美的崇敬之心，直斥具紫紅斑的鈞瓷器形崩頹、格調低下、耽溺於官能性的色彩，是一種末流現象、金元趣味。㊵或許是稟著珍重「宋磁」之崇高性的心情，大谷光瑞提出了鈞窯始於金代之說，並舉陽翟縣金代以後才改稱「鈞州」爲證，㊶此說法至少早於陳萬里、關松房約廿年。㊷不過，正如尾崎洵盛所反駁：宋代禹縣之窯可能以其它名稱存在，㊸僅由地名之存廢判斷窯業之有無不啻本末倒置。

1937年尾崎洵盛氏在〈宋元の陶磁〉一文中企圖將自1920至1930年代鈞窯研究做一總結。他成功地掌握了中、日、西文三方面的研究資料。首先，

㊱ 劉子芬，《竹園陶說》：「馬窯不見於前人著述中，市肆中人遇仿造均窯釉汁之器，泥均以外概以馬窯呼之，據言爲元人馬姓所造。」收在《陶瓷譜錄》，下，頁436。

㊲ 晉佩章引述傅振倫《鈞窯瑣談》的未刊稿：「清代末年有高姓者在北京西郊燒造鈞瓷，但胎質粗鬆不及眞鈞的精緻堅實，英人買去的仿製品稱之曰：軟鈞。」晉佩章，《鈞窯史話》（北京：紫禁城，1987），頁61。

㊳ 如A. W. R. Thiel, *CHINESE POTTERY AND STONEWARES* (N.Y.: Thomas Nelson & Sons, 1953), pp. 52-54。

㊴ 就筆者所知，「綠鈞」一詞首見於1953年Brasil Gray, *EARLY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London: Faber & Faber, 1953), p.32.

㊵ 久志卓眞，《支那の陶磁》（東京：寶雲舍，1932），頁137-142。

㊶ 大谷光瑞，《支那古陶磁》（京都：陶雅會，1932），頁44-45。

㊷ 陳萬里，〈異軍突起的鈞窯〉，《中國青瓷史略》，1956年，收在《陳萬里陶瓷考古論文集》（香港：兩木，1990），頁105-106；關松房，〈金代瓷器和鈞窯的問題〉，《文物》，1958年2期，頁25-26。

㊸ 尾崎洵盛，〈宋元の陶磁〉，見長坂金雄編，《支那陶磁史I：陶器講座13》（東京：雄山閣，1937），頁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日本學者縈繞於心的鈞窯時代問題給予回答。根據窯址踏察的資料（北方窯址的實地探索亦自日人始），汝窯與鈞窯僅以佛耳山相隔，地理上相當接近。北宋時汝窯聲名大噪，陽翟縣產品仿汝並冒汝窯之名。南宋後汝窯衰落，鈞窯產品漸盛。總之，此二窯是同一類，不過初以汝、後以鈞名之。㊹其次，針對西方關心的分類辨別問題，他將鈞瓷依胎釉特色分爲三群。㊺雖然此分類結果與Hobson的分類雷同，但尾崎勝於Hobson處在於：Hobson將陳設器與日用器一視同仁，而尾崎則感覺到陳設器與日用器在製作精緻上的差異，告訴讀者陳設器“素有明代所製之說”。㊻雖然最後仍因這類作品的巧緻作風與宋瓷有共通處而認爲難以否定其爲宋代產品，但在概念上已將陳設器獨立在鈞瓷發展序列之外。

B. 1940--1974

在「西方發現東方」的高潮稍歇後，鈞窯的研究在往後的近四十年頗爲平靜。中國方面可用1963年《中國的瓷器》一書爲代表。㊼此書綜合了陳萬里與關松房二氏之看法，㊽並加入中國在1949年以後正式的考古挖掘資料。雖然陳、關二氏的看法遲於日人甚久，但當時資訊不發達，也許可不將之視爲剽竊他人智慧財產，而看成是「英雄所見略同」。此後直至1970年代，中國因爲文化大革命之故，對鈞窯的研究長時期沒有重要的進展。

日本的學者這段時間內對鈞窯著墨亦極罕。也許眞是民族共通品味之故，連鈞瓷的收藏都遜於歐美。㊾值得一提的是，在鈞台窯報告發表約十年前，小山富士夫已利用此項資料來說明鈞瓷陳設器的製造時間可能早在北

㊹ 同註㊸。

㊺ 尾崎洵盛，〈宋元の陶磁〉，頁63-82。

㊻ 尾崎洵盛，〈宋元の陶磁〉，頁76。

㊼ 輕工業廳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編著，《中國的瓷器》（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3），頁143-148。

㊽ 即鈞窯於金代開始燒造，同註㊷。

㊾ 小山富士夫，〈わが國にある中國の陶瓷〉，《東洋美術》，14（東京：朝日，1967），頁19。

宋。㊿資料掌握良好是日人研究的一大特色。

歐美的研究此時暫居領先地位。所提出的問題頗具創造力，而且這幾個問題一直到今天仍爲衆學者津津樂道，然答案似乎也懸而不決。第一個問題是唐代花瓷與鈞瓷的關係。Garner認爲鈞瓷的製造技術繼承自花瓷。(51)其次是鈞瓷陳設器爲宮庭內府使用之器的可能性。(52)因爲敘述者並未提出充份的理由，只是直述他們的結論，而且晚近有更多這方面的討論，故此項容後再敘。

第三個問題即傳世鈞窯器的時代歸屬。此群鈞瓷器形有出脊尊、渣斗式花盆、仰鐘式花盆、鼓釘式承盤，及海棠、葵花、蓮花、方型、六角形的花盆及承盤。通常周身呈同一色調，或器體內外分呈二色、或通體以二色漸層交融分佈。外底上釉，釉厚處呈青色、薄處呈褐色。花盆底部多有五孔，除方形花盆偶用支釘外，無支釘痕。出脊尊底部亦不用支釘燒。各式承盤均有一圈支釘支燒痕。各式器形底部多有一至十的中國數字。這群陳設器截至目前爲止未曾自任何墓葬中被發現。其與另外一群碗、盤、瓶、爐等墓葬中可見的日常生活用品不論在胎、釉、燒造特徵上經常有極大的差異。因爲缺乏紀年物，所以其製造年代一直教人存疑。

除了前述尾崎對定年代的遲疑外，1953年Brasil Gray比較明三彩與陳設器鈞瓷的器形，認爲非常相似，故其有可能是十五世紀的產品，且時代可稍稍向前挪移。(53)不過，明代華南三彩的窯址不明，大多外銷。由國外遺址的出

㊿ 小山富士夫，〈わが國にある中國の陶瓷〉，頁19。歐洲學者亦在鈞台窯報告發表前用到此資料，不過那是在1974年。見Cecile and Michel Beurdeley, *A CONNOISSEUR'S GUIDE TO CHINESE CERAMICS* (London: Harper & Row, 1974), p. 122。

(51) Harry M. Garner, “Early Chinese Crackled Porcelain,” *TRANSACTIONS OF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32 (1956-60), p. 28; Michael Sullivan也曾提及，見*CHINESE CERAMICS, BRONZES, AND JADES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ALAN AND LADY BARLOW* (London: Faber & Faber, 1963), p. 45.

(52) Walter Hochestadter, “Ceramics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Sung Periods,” *EARLY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BUFFALO MUSEUM OF SCIENCE* (Buffalo, N.Y.: Hobbies, The Magazine of the Buffalo Museum of Science, 1946), p. 27。

(53) Brasil Gray, “Northern Sung Wares,” *EARLY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London: Faber & Faber, 1953), p. 31。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土物看來，器形只有壺、水滴、水注、與盤類，[54]似乎不可能找到相似器物。唯一可能的是，Gray 所謂「三彩」是指同爲低溫鉛釉的「法華器」。若此，則Gray的看法的確提供了一個思考方向。可惜法華器生產地不確定，年代亦不知所以，若眞要比對，則先得解決其本身發展編年的問題。

二十年後（1974），無視鈞台窯發現陳設器鈞瓷碎片的傳聞，Margaret Medley女士重申對此群鈞瓷年代的懷疑。根據胎釉與另一群不同、器形巨大有元代風味的特點，加上製作技巧的複雜暗示其背後有先進的半工業（semi-industrial）技術，認爲其年代應爲元末明初。[55]在古文獻方面，她舉《大明會典》爲輔證，說河北眞定府出產帶數目字的器皿，而鈞陳設器可能產於附近。[56]然而就如前所述，《大明會典》中的「五瓶罈」、「十瓶罈」並不能確定爲帶數目字的罐甕；且Medley未能針對出土資料進行檢討。縱然一切的現象使得Medley的推論相當令人嚮往，但可惜缺少更有支持力的證據。

C. 1975-1995

（1）關於傳世鈞窯器之年代

1975年河南省禹縣鈞台窯窯址報告的出版扭轉了鈞窯的研究態勢。[57]中國的研究急劇增加，使原本已甚囂塵上的「北宋官鈞」假說得到肯定，相關研究的論文較以前大量增多。日本方面的學者基本上保持謹慎的持疑態度，而西方除了某些毫不猶豫地接受出土狀況的學者外，[58]大多仍堅持元末明初的看法，其中 Medley 女士爲最佳代表。

1976年她甚至顚覆性地認爲傳世鈞窯器是否能被算入鈞瓷的範疇還是一

[54] 參見龜井明德，〈明代華南彩釉陶おめぐる諸問題〉，《日本貿易陶磁史の研究》（京都：同朋社，1986），頁339-354。

[55] Margaret Medley, *YUAN PORCELAIN AND STONEWARE* (London: Ditman, 1974), pp. 90-96。

[56] Margaret Medley, *YUAN PORCELAIN AND STONEWARE*, p. 93。

[57] 同註①。

[58] 如W. B. R. Neave-Hill, *CHINESE CERAMICS* (N.Y.: ST. Martin's Press, 1976), pp. 66-71; Penelope Hughes-Stanton & Rose Kerr, *KILN SITES OF ANCIENT CHINA* (London: Oriental Society, 1980), p. 85; Masahiko Sato, *CHINESE CERAMICS: A SHORT HISTORY* (N.Y. & Tokyo: Wheather Hill, 1981), pp. 117-119; G. St. G. M. Gompertz, *CHINESE CELADON WARES* (London: Faber & Faber, 1982), pp. 83-125。

個問題。[59]因爲自胎、釉特徵觀察，其與臨汝、禹縣產品相差甚遠，反而可能出產自十四世紀因紅瓷出名的河北「眞定府」。她並認爲傳世鈞窯器始作於十四世紀，延燒至明。並將此類鈞瓷上的數字與社會經濟現象相結合，在工業初興的中國，顧客利用號碼訂購陳設器。[60]

回歸到當時陶瓷史學者所熱衷的「爲元瓷翻案」學術背景，我們或許較能瞭解Medley爲何在缺乏有力實證的狀況下一再強調鈞陳設器始於元代。但是她對於鈞台窯有如視而不見般的隻字不提卻費人猜疑。爲何對出土狀況漠視罔聞，未對窯址報告提出有力反擊，反而緊抓著《大明會典》對眞定府的紀錄？是否以此宣示此報告之不足信？承繼Medley看法的還有 Rosemary E. Scott，所持理由亦爲其具元瓷"大而重"之特色。[61]

就如長谷部樂爾氏所言，其實學者對於鈞台窯最不放心處在於其伴隨而出的磁州窯器完全是金、元時代的器皿，[62]若其中只有一小群器皿獨樹一格地屬北宋，的確太過突兀。從日人對鈞窯少數的研究資料中我們可發現，自1980年代以降，學者對北宋的說法持保留的態度。（不過，1987年長谷部氏在討論宋代陶瓷的一場演講中，舉傳世鈞瓷失透性釉色爲例，說明北宋末釉色之美感。並稱呼其爲「被稱爲官鈞窯的…宮中用植木缽類…」，言下之意似乎在無強力證據支持的情況下，接受了中國學者積非成是的「北宋官鈞」說

[59] Margaret Medley, *THE CHINESE POTTER: A PRACTICAL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Oxford: Phaidon, 1976), p. 121. 此點 Mary Tregear 在*SUNG CERAMICS* 一書中曾有所回應，認爲Numbered Chun Wares雖然年代未明，然而是鈞瓷無誤。見*SUNG CERAMICS* (N.Y.: Rizzoli, 1982), p. 147。

[60] Margaret Medley, *THE CHINESE POTTER: A PRACTICAL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pp. 118-122.

[61] Rosemary E. Scott,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1989), p. 64. 除此之外，還有學者認爲 Numbered Chun Wares生產時代爲自金至元。因爲陽翟縣金代始改稱"鈞州"，且鈞台窯其它出土品是元代陶瓷。見Henry John A. Kleinhenz, *PRE-MING PORCELAINS IN THE CHINESE CERAMIC COLLECTIO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Ph.D. Diss., Case Western University, 1977), pp. 261-331。

[62] 長谷部樂爾，〈元代の磁州窯、吉州窯その他〉，《世界陶磁全集》，13（東京：小學館，1981），頁257。

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 期刊資料庫

法。）[63]

步入九〇年代、世紀末時期，矢部良明再次企圖扭轉日人對鈞瓷的評價，強烈地刻畫鈞瓷的魅力，認爲眞正理解鈞瓷之美者就能體會其深深的靜謐所反映的高尚感。除了美學上的反動外，對鈞瓷陳設器的年代有更慫動性的推測。他認爲此群鈞瓷在造型上與宋、元陶瓷出入頗大，看起來肥厚而生硬。釉色內外之不同令人想起洪武年間的五爪龍印花皿，其亦爲內外分色；而且明朝宮廷御用器常企圖捕捉宋王朝之趣味，所以可能是有明一代長時間產燒之器類。[64]此說或許深受Medley女士的影響，橫向的比對雖表露了矢部氏對每一個時代氛圍中特有的陶瓷趣味的理解，然而此推測距證實的階段仍遙遠。

反觀中國的研究，不但對鈞台窯的調查結果深信不疑，且完全忽略了研究史，並將其是否爲官窯的這個瓷窯性質問題與年代問題糾纏結合。以日用鈞瓷的起源與分期觀點強加於鈞瓷陳設器的研究，遂使疑團越滾越大。而該一極有待商確、幾近於輕率的說法，卻爲絕大多數中國研究者所接受，並理所當然地在此一可能是錯誤的基礎上進行研究。

1964年馮先銘氏曾推測北方鈞窯系形成於北宋，因爲傳世鈞窯在質量造形上與北宋定、汝官窯有共同點，且「奉華」銘與汝瓷上的銘文相同。金代無奉華殿，故其爲北宋製品。[65]鈞台窯發現後，因爲有「宣和元寶」錢範爲「時代證明」，「證實」了馮氏之說。此後中國學者一致同意傳世鈞瓷爲北宋官窯，自1970年代至1990年代，論述的文章數量雖有所增加，然而內容卻了無新意。[66]其中比較重要的觀念大多來自馮先銘、趙青雲、李輝柄三位學

[63] 長谷部樂爾，〈中國陶磁展に因んで--宋代の陶磁を中心にして--〉，《出光美術館館報》，no. 57（1987），頁25。

[64] 矢部良明，《中國陶磁の八千年》（東京：平凡社，1992），頁232-240。

[65] 馮先銘，〈河南省臨汝縣宋代汝窯遺址調查〉，《文物》，1964年8期，頁26。

[66] 如汪慶增、陳堯成，〈鈞窯瓷和紅銅釉〉，《陶瓷史話》（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2），頁85-94；孟天雄、章泰娟，《陶瓷漫話》（長沙：湖南省新華書店，1983），頁8-11；華石編，《中國陶瓷》（北京：文物，1985），頁119-120；葉喆民，《中國陶瓷史綱要》（北京：輕工業出版社，1989），頁140-143；陳文平，《中國古陶瓷鑑賞》（上海：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1990），頁69-70；李正中、朱裕平，《中國古瓷匯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頁21-26；趙自強，《古陶瓷鑑定》（廣州市：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頁26-31；李紀賢，《中國古代陶瓷百圖》（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頁28-30。

者，他們的思路均將陳設器與日用器一概而論，且多次撰文宣傳揚此說。[67]就中以近年李輝柄氏的〈鈞窯系的形成與分期〉爲上述「中國式」看法之代表作。李氏利用宋史中「花石綱」的記錄推測鈞瓷陳設器是爲了滿足宋徽宗時宮廷需要而設計燒造，因此其「官鈞」的性質就此成立，時間在1101-1126年間。而官窯是在「民窯」基礎上建立，故1086-1100年有「民鈞」燒造。他並將金、元各分一期略述該其特色。[68]

事實上，企圖說明兩群在胎、釉、器形上都大不相同的兩群瓷器如何相承繼發展不是容易的事，而能從考古資料上確定爲北宋鈞瓷者目前並不存在。李氏在文中對此二點完全沒有交代。「花石綱」的記錄中並未提及鈞瓷陳設器，故所謂「官鈞」的性質與時代至多只能算是一種大膽的假設罷了。奇怪的是，中國大陸的學者竟完全滿意於此「假設」狀態，毫不遲疑。

（2）其它研究方向

1975年以後鈞瓷研究的另一個重點在其「起源」與「階段性發展」，而以中國方面著墨較多。

如前所述，學者認爲鈞瓷的起源與唐花瓷或汝瓷有關。在花瓷方面，Gray之後日人佐藤雅彥也提出相同看法，[69]但在日本並未得到太多的呼應。而此說則受到許多中國學者的肯定。[70]然而，相對於花瓷的生產集中於西元九世紀，目前並無可資確認屬北宋時期的鈞瓷作品，時間上有相當長的斷層，故兩者之間的關係目前不明。

[67] 趙青雲，〈鈞瓷的起源、興衰與復甦〉，《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頁47-52；〈鈞台窯的興起與昌盛〉，《景德鎮陶瓷》，26期（1984），頁170-176；〈窯變藝術之冠--中國鈞瓷〉（待刊稿，1992年）；《河南陶瓷史》（北京：紫禁城，1993），頁88-92。馮先銘，〈鈞窯與鈞窯系〉，收在中國陶瓷史編委會編，《中國陶瓷史》（台北：胡氏出版社，無出版年），頁235-239；〈有關鈞窯諸問題〉，《中國古陶瓷論文集》（香港：兩木，1987），頁291-294。李輝柄，〈鈞窯的性質及燒造年代〉，《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年，2期，頁55-58；〈鈞窯系的形成與分期〉，《河南鈞瓷汝瓷與三彩——九八五年鄭州年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1987），頁13-20；《宋代官窯瓷器》（北京：紫禁城，1992），頁38-50。

[68] 李輝柄，〈鈞窯系的形成與分期〉，頁13-20。

[69] 佐藤雅彥，《中國陶瓷史》（東京：平凡社，1978），頁139-141。

[70] 關於花瓷與鈞窯的關係在中國的研究概況，余佩瑾女士的〈略談宋鈞窯瓷器〉一文中有簡單扼要的介紹。見《故宮文物月刊》，130期（1994年），頁39-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86年寶豐清涼寺汝窯「窯址」發現後，由於汝、鈞瓷片混雜存在，鈞汝關係又再次成爲熱門話題。范冬青等人認爲鈞瓷自宋初開始生產，汝瓷是鈞窯中較精緻的一種。[71]但晚近發現寶豐窖藏中的汝瓷，由器形判斷可早至北宋早期，[72]而現存鈞瓷中疑爲北宋器物者不過傳聞中清河縣所出土的「元代型」鈞瓷，[73]難以判定時代先後。而且涉及開窯問題，殊難解決。[74]

至於階段性發展的課題，觸及要害的論述不多。[75]〈論元代的鈞瓷〉一文雖對元鈞加以描繪，可惜所舉實例多爲衆人所熟知的元鈞概念中的器形。[76]難以得知清楚的序列發展。

除了以上種種，西方的研究趨向是試圖將陶瓷史與文化史更緊密地結合。如I. L. Legeza認爲鈞瓷是爲宋代國家祭祀儀式而燒造。如西元十世紀後半（北宋初）祭典禮服爲青色，當時的鈞瓷大多也是青色。他並將收錄於《道藏》，著於十三世紀的《上清大洞三景玉清隱書絕錄》中，道教天師所繪符咒的不規則曲線圖紋與鈞瓷上的蚯蚓走泥紋相提並論，企圖證明北宋時鈞瓷陳設器與道教的密切關係。[77]又如Rogers利用許多繪畫資料研究北宋官窯器的共通風格。[78]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結合，繼而給與文化史一個嶄新的視

[71] 范冬青、周麗麗，〈河南省寶豐清涼寺汝窯窯址調查〉，《汝窯的發現》（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頁28。

[72] 趙青雲、王黎明，〈河南寶豐發現窖藏汝瓷珍品〉，《華夏考古》，1990年1期，頁51-55。

[73] 尾崎洵盛，《支那古陶磁の鑑賞》（東京：北原出版社，1944），頁395；Niles Palmgren, *SUNG SHERDS* (Stockholm: Almorist & Wiksell, 1963), pp. 286-290。

[74] 最近方龍驤提及台北市善導寺佛教歷史博物館藏有北宋淳化三年(992)款的「均窯玫瑰兔絲斑文趺坐佛陀像」。該佛像不論由佛像風格變遷發展，或由陶瓷史的觀點看來，都應屬後仿。見〈漫話鈞窯〉，《中國文物世界》，113期（1995年），頁109-123。

[75] 參見趙光琳、張寧，〈金代瓷器的初步探索〉，《考古》，1979年5期，頁461-471；范冬青，〈試論元代製瓷工藝在我國陶瓷發展史上的地位〉，《上海博物館館刊》，1981年1期，頁95-110。

[76] 關甲昆，李金德，〈論元代的瓷器〉，《考古與文物》，1990年3期，頁96-99。

[77] I. L. Legeza, "A New Appraisal of Chun Ware," *ORIENTAL ART*, vol. 18, no. 3 (1972), pp. 267-176。

[78] Mary Ann Rogers, "The Mechanics of Change: The Creation of a Song Imperial Ceramic Style," in George Kumayama 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ART OF CERAMICS IN CHINA* (Los Angeles: Far Eastern Art Council,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92), pp. 65-79。

野當然是陶瓷史家的願望與自我期許。然而此二位學者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北宋官鈞」的概念，並以此爲基礎去構思文化史上的議題。筆者以爲在鈞瓷年代尚未釐清之前，這種作法陷入了本末倒置的危險中。

二、傳世鈞窯器的時代問題

1. 鈞台窯址之狀況

位於河南省禹縣北城門內的鈞台窯址是目前所知唯一生產傳世鈞瓷之古窯遺址。[79]曾於1975年在總面積三十萬多平方公尺的範圍內開十四個探方，1986、1987年左右又加開四個探方。所發現之陶瓷種類計有鈞瓷、汝瓷（臨汝型）、黑釉瓷與磁州窯系等。雖然報告中亦提及發現影青二件，然其一之斗笠碗（圖1）不論形狀或紋飾皆與南方作品相同，且爲孤例，應非禹縣所產。另一件被定爲影青之器蓋（圖2）於化粧土上施透明釉，再於蓋鈕周圍施綠釉以點綴，應屬北方磁州窯系，並非一般常識理解中的青白瓷。各種瓷類大致分區燒製，然亦偶見混雜。主製鈞瓷之窯共有六座，但只有三座經挖掘。

圖3爲此已經發掘三窯之相關位置，爲方便敘述，文中簡稱A、B、C窯。A爲報告中的「雙火膛長方形窯」（一號窯），曾發現鈞瓷陳設器破片，B、C爲一般馬蹄形窯。A、B、C三窯位置集中，皆爲就地挖築之土壁窯。現今A、B二窯已加蓋房屋保護。在B窯西方的一塊約8公尺寬，13公尺長之土地上（圖3D，現已被種滿農作物，現況見圖4），據趙青雲先生對筆者之介紹，此區域有大約三十多個小坑，深幾十公分至一點五公尺不等。坑中共出土幾十件帶號碼的鈞瓷陳設器，以鼓釘洗爲最多。同時在表土層以下之地層中亦發現碗、缽等鈞瓷碎片。D區西邊稍北（圖3E處）即「宣和元寶」錢模之發現地點。由於鈞瓷陳設器之被「確定」爲北宋官窯產品與鈞台窯址之窯形、此地發現之錢模及碗盤年代有不可分的關係，茲事體大，故本節擬檢視鈞台窯報告之可信度與其問題。

A. 所謂「雙火膛長方形窯」之商榷

如圖3，位於北邊（A）的鈞台窯址一號窯基，根據考古報告，是目前絕無僅有的「雙乳狀火膛窯」（圖5）。[80]東西總長約3.8公尺，南北總長約3.5公

[79] 同註①。

[80] 趙青雲，〈河南省禹縣鈞台窯的發掘〉，頁57。

臺灣大學藝術 期刊資料庫

尺；窯室南北長約1.6公尺，「雙火膛」東西各寬約1.6公尺，南北深1.4公尺，一般而言算是相當小的窯爐，[81]中國僅此一例。因在此曾發現鈞瓷陳設器殘片，所以當筆者於1994年考察該窯址時趙青雲告訴筆者：此窯爲北宋宮中試驗性窯爐，專燒鈞瓷陳設器，北宋亡時即廢棄不再使用。言下之意似乎「雙乳狀火膛窯」是專門燒製鈞瓷陳設器的窯爐。[82]然而同樣支持北宋官窯說，且亦親自至鈞台窯觀察的李輝柄卻指出：在圓形的「單形窯」（即圖3B處）與「雙火膛窯」皆燒造此類鈞瓷。[83]並不一定得用「雙火膛窯」才燒得出玫瑰紫、海棠紅。趙、李二氏爲陶瓷考古學者，或許對窯爐結構與其所形成之燒造環境、化學反應並不一定瞭若指掌。不過二者對窯址狀況說法不一之混淆現象，卻顯示有關鈞瓷起始年代之重要報告頗有可疑之處。

專門研究陶瓷燒造過程之W. David Kingery則曾利用鈞台窯一號窯爐之形式，想像並企圖復原鈞瓷之窯製（圖6）。文中Kingery將鈞瓷釉乳濁、窯變等特徵形成之因深入淺出地解釋一番。[84]不過，他用鈞台「雙火膛窯」所想像生產的，不是鈞瓷陳設器而是碗盤之類的日用器。Kingery做如是推想之可能原因有二。其一爲誤讀中文考古報告，且忽略中國北方其它產碗、盤等日用鈞瓷之窯皆爲普通饅頭窯，而引用了專燒「北宋鈞瓷陳設器」之瓷窯來解釋金元時代常見鈞瓷盤之生產過程。[85]另一可能即Kingery詳知鈞台窯狀況，卻仍堅持以之詳示金元時期碗盤類鈞瓷之燒製法，用以表明此窯年代不早至北宋，或用以說明鈞瓷陳設器與碗盤類鈞瓷可用同式窯燒造。

[81] 窯爐尺寸數字由〈河南省禹縣鈞台窯的發掘〉報告附圖之比例尺推算而得。報告中提及東火膛氣孔（即圖5中的火孔），直徑爲22釐米。見趙青雲，〈河南省禹縣鈞台窯的發掘〉，頁57。利用比例尺與圖中所示長度換算之結果，直徑爲23.5釐米，顯示推算結果與實際丈量所得誤差約爲10%。

[82] 趙青雲在《河南陶瓷史》，頁91，亦曾指出「雙乳狀火膛窯」對造成特殊還原燄以燒製「海棠紅」、「茄皮紫」等鈞瓷陳設器之釉色有特別的作用。

[83] 李輝柄，《宋代官窯瓷器》，頁47。

[84] W. David Kingery & Pamela B. Vandiver, *CERAMIC MASTERPIECES* (N.Y.: The Free Press, 1986), pp. 93-109.

[85] Kingery所用以圖示解說鈞台一號窯燒製產品者，爲一金元時期常見日用型鈞瓷盤。見Kingery, *CERAMIC MASTERPIECES*, p. 95.

在判斷此三位學者說法誰是誰非之前，讓我們先檢查此窯之構造。圖7爲鈞台雙火膛窯發掘不久時所拍攝之照片。「雙乳狀火膛」方向向北。報告中介紹此窯：「東火膛僅留有圓形氣孔，直徑爲22厘米；西火膛留有窯門，上邊還有方形煙囪。在窯室後壁中間和兩角處共設有三個扇面形煙囪。」[86]若對照此段文字與圖7窯爐照片，東火膛（左邊）圓形氣孔（即圖5之火孔）隱約可見，西火膛（右邊）方形煙囪還算清楚，然而所謂「窯門」在何處？窯門寬度大小至少需容窯工一人出入，高度不必太高，但因爲窯工至少雙手必須捧匣缽，故雖可令其彎腰行進，但窯門不得矮到使之必得爬進窯內。然從照片上完全看不出有窯門的跡象。

若測量其線繪圖（圖5）並比照比例尺計算，火孔離所報告之22公分不遠。然窯門則至少有47公分寬，何以照片完全看不出來？由縱剖面線繪圖（圖8）可得知窯門頂部距地面約65公分。任何正常成人要經過一65公分高之門限都得蹲下來。試問如何搬動大而「寶貴」、裝在匣缽，用支釘支撐的「官鈞陳設器」，且不至有損傷？更何況線繪圖根本不準確。窯門、火孔事實上並不向外凸出不說，窯門高度根本不可能與窯床同高，因爲根據筆者實地勘察，窯床高度大約只有25公分左右（圖9）。另外，東火膛之火孔有二，並非如報告中所謂之一個（圖10）。可惜的是，不知爲何如此湊巧，西火膛竟因雨水滴漏而「崩塌」（圖11），再也不能觀察窯門位置了！

學界目前將此窯歸類爲半倒焰窯，屬北方常見馬蹄形窯之一型。[87]然而半倒焰馬蹄窯是自昇焰式圓窯改進而來，利用將排氣孔移至窯爐後壁之作法，使焰形流經窯頂後倒向窯後，延長火焰在窯腔內停留之過程，以充份利用熱能（圖12）。而鈞台「雙火膛窯」竟在窯爐上方開煙囪，豈不是反其道而行，窯焰一開始就向外散逸，回到原始昇焰窯的焰形（圖13）？[88]

北方馬蹄形窯發展至北宋，燃燒室通常向下挖得很深，火床下有漏灰槽，灰爐自動落下以便在火床上加煤。如耀州窯窯址（圖14）[89]由縱剖面看（圖15），窯床高出火膛底部很多。另外，窯床與煙囪間通常有一堵帶煙孔的

[86] 趙青雲，〈河南省禹縣鈞台窯的發掘〉，頁57。

[87] 熊海堂，《東亞窯業技術發展與交流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72。

[88] Kingery將此「煙囪」解釋爲「投柴口」(stoke hole)，想必是意識到此矛盾之故，見圖6。

[89] 禚振西、盧建國，〈耀州窯遺址調查發掘新收獲〉，《考古與文物》，1980年3期，頁58，圖7。

臺灣大學藝術 期刊資料庫

壁。也就是基於此種對窯式的基本概念，使報告者判斷鈞台一號窯窯門向北，煙囪在南。可是據說鈞窯是以柴爲燃料⑩，欲加熱至所需溫度（攝式1250度）得持續燒窯三天以上⑪。此窯窯床與火床底部高度相差不到30公分，整個火膛體積又小，柴所佔體積比煤大得多，如何不停加柴，不停地清掃灰燼而保持溫度持續上升，並使窯爐氧化、還原氣氛之改變不致擾亂所欲釉色之形成，是一大問題。此外，雖曰「雙火膛」，東火膛中只能在窯燒初始置柴，一但火起，無適當門徑可添入新柴。如此則火力減半，東火膛有如多餘，反而亦造成窯內溫度分佈不均之現象。

再者，一般半倒焰窯窯床後部之吸火孔通常位於底部接近窯床面（圖12）以引導窯焰下降，使之包圍整個待燒之瓷胚。如鈞台另一鈞瓷窯爐（見圖16，其即位圖三B處之窯）吸火孔位置即屬正常。然一號窯缺此吸火孔，只見「扇形煙囪」，位置高於窯床甚多，易導致瓷胚背火膛一面受不到熱之缺點，不可能如是設計。

其實，所謂的「雙乳狀雙火膛長方形窯」可能只是判斷失誤之後所創之假想詞，事實上並不存在。檢視窯爐發展過程可發現，帶有所謂「雙乳」狀局部之北方窯爐在宋代以後比比皆是，只不過，它們不是火膛而是煙囪。北宋早期以前，雙煙室之設計已存在，然以方形雙煙室爲主（如圖17）⑫。其後如金元時期的陝西旬邑安仁窯（圖18）⑬、宋、金時期河北磁縣觀台窯（圖19）⑭，都帶有圓形「雙乳狀」煙室，後此種圓形煙室之應用直至明代仍見得到。鈞台窯一號窯爐之「雙火膛」可能只是一般馬蹄窯之圓形雙煙室。此窯窯門可能向南，唯發掘不完全至不見火床、窯門等部分。回到圖3，據趙青雲指出，A、B、C三窯鼎立，間有通道及作坊，由工作流程想像，一號窯（A）若面向南，其餘二窯向北，亦較合乎作業簡便之原則。

論者可能以「煙囪底部應高於、或至少與窯床齊高」之條件反駁「雙火膛」爲雙煙室之說法。的確，宋代以前之馬蹄窯煙室底部通常不低於窯床。然而南宋以後，如四川省鋸木灣窯（圖20）⑮、山東磁村金代窯（圖21）⑯、乃至景德鎮明代蛋形窯（圖22）⑰煙室皆低於窯室，故煙室地面不必較高。

雖然目前仍難判定窯址中所謂「三個扇形煙囪」（圖7）是否爲區隔窯室與煙室之牆與吸火孔，或任何其它可能，不過仔細看挖掘之痕跡（圖23）可發現，在「扇形煙囪」下部似重疊著兩個並列與「雙火膛」相似的土製弧狀物，可能是另一窯之煙室，顯示此處有多重疊壓關係。鈞台一號窯邊界不止於此，應向南再延長，即此窯並非爲特別之小窯。觀察鈞台一號窯之比例可發現其與山東濟南磁村金代窯（圖21）、淄博坡地金至元代窯（圖24）⑱相似，或許年代不早至北宋。

現在我們回頭檢視趙青雲、李輝炳、Kingery三人之看法。趙青雲氏對窯爐方位之判斷頗有疑點，且其報告之誠信度令人憂慮。因爲報告過於簡單，未發表之細節仍多故李氏「單形爐」亦產鈞瓷陳設器之說法頗有可能。Kingery對燒窯之復原圖除想像外還有誇大成份，如圖6，Kingery加大了「窯門」、省略「東火膛」之問題、加高窯床，降低「扇形煙囪」位置，對瓷胎及匣缽如何置入窯中的問題視而不見。其實，這些是被所有因鈞台窯之發掘而相信「北宋官窯說」的學者，及駁斥「北宋說」的學者所遺漏了的問題。⑲

⑩ 晉佩章，〈鈞瓷的還原火與還原燄〉，收在《河南鈞瓷汝瓷與三彩：一九八五年鄭州年會論文集》，頁53。

⑪ W. David Kingery & Pamela B. Vandiver, *CERAMIC MASTERPIECES*, p. 97.

⑫ 杜葆仁，〈耀州窯的窯爐和燒成技術〉，《文物》，1987年3期，頁33，圖3。

⑬ 咸陽地區文物館理委員會，〈旬邑安仁古瓷窯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0年3期，頁42，圖5。

⑭ 北大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磁縣觀台磁州窯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4期，頁17，圖38。

⑮ 重慶市博物館、南岸區文物館，〈四川重慶涂山鋸木灣宋代瓷窯發掘簡報〉，《考古》，1991年3期，頁229，圖2。

⑯ 山東淄博陶瓷史編寫組，〈山東淄博市淄川區磁村古窯址試掘簡報〉，《文物》，1978年6期，頁47，圖2之2。

⑰ 劉新園、白焜，〈景德鎮湖田窯考察紀要〉，《文物》，1980年11期，頁42，圖9。

⑱ 淄博市博物館，〈山東淄博地區窯址的調查與試掘〉，《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1984），頁360-373。

⑲ 如長谷部樂爾雖曾因鈞台窯其它伴出陶瓷皆爲金、元時代之物，而對鈞瓷陳設器年代質疑，但卻未曾對「雙乳狀火膛窯」之判定做任何批判，見〈元代の磁州窯、吉州窯その他〉，頁257。又Margaret Medley雖倡言鈞瓷陳設器爲元代製品之說，亦未能據此窯在判斷上之失誤以爲北宋說之反證。見 *THE CHINESE POTTER: A PRACTICAL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pp. 118-122。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B.「宣和元寶」錢模

在鈞台窯發現的「宣和元寶」錢模一向被認爲「爲解決官鈞窯時代問題提供了實證」⑩。學者利用此錢模將北宋宮廷始燒官鈞陳設器年代定爲北宋，且得以縮小時間範圍至徽宗宣和以後。由於宋代錢由政府派專官督造，錢模之存在暗示官方介入，它又強化了鈞台窯是官窯說法。⑩其存在對鈞瓷陳設器之種種問題而言佔有不可忽視之地位。此錢模（圖25）據說大小約7公分見方，以鈞泥製成，其上還有一滴青黃色鈞釉（如鈞陳設器底部之釉）。⑫

「宣和元寶」是宋徽宗時所鑄年號錢之一種。北宋自太宗太平興國年間（976-983）鑄「太平通寶」後，幾乎每改一次年號就鑄新錢，稱爲「通寶」、「元寶」或「重寶」。有的年號錢名目多至一二十種。書體有篆、隸、眞、行、草及瘦金體，並且在淳化（990-994）之時始開「御書錢」之風。⑬鑄錢事業由政府在礦區設「監」，其次設「冶」、「務」和「場」統籌管理。⑭徽宗宣和年間（1119-1125）曾鑄「宣和元寶」及「宣和通寶」二種，質料分銅、鐵二類，書體則爲篆書或隸書。「宣和通寶」分小平、折二、折三與小平鐵錢等數種，所鑄數量較多，以致考古出土之宣和錢通常是「宣和通寶」，⑮「宣和元寶」則只有平錢。⑯

由政府監造之錢幣在品質上都有一定水準。以長沙高塘窖藏爲例（圖26），⑰雖然錢幣年代由北宋淳化元年至南宋淳熙二年，形式包含寬廓、窄沿、背記及對品等，然輪廓皆渾圓，字體清晰端正，書法頗佳。反觀鈞台出

⑩ 李輝柄，《宋代官窯瓷器》，頁52。

⑩ 趙青雲，《河南陶瓷史》，頁91。

⑫ 筆者於1994年考察該窯址時，趙青雲回答筆者之問題所述。

⑬ 戴志強，〈淺析宋代的年號錢〉，《中原文物》，1983年4期，頁86-90。

⑭ 陳尊祥、華覺明、張宏禮，〈宋代鐵錢鑄造考略〉，《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2期（1989），頁122。

⑮ 戴志強，〈淺析宋代的年號錢〉，頁89。

⑯ 清朝初尚齡在〈吉金所見錄〉中亦曾提及：「徽宗宣和通寶大小錢近今多而易得，惟此兩種（指宣和元寶）頗少。」收在桑之行等編，《說錢》（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頁785。

⑰ 長沙市文物工作隊，〈長沙發現宋代銅錢和銅器窖藏〉，《文物資料叢刊》，10期（1987年），頁198-191。

土錢模，錢形外圍不圓、四個模型大小不一、內部方框不正。若比對著錄上之「宣和元寶」（圖27）則可發現錢模宣和元寶四字字跡拙劣，與官造幣相差甚遠，且「宣和元寶」四字之排列也非如錢幣般之順時鐘方向。中國鑄幣雖曾使用疊鑄，然隋以後即未曾出土疊鑄錢范及模具。唐代以後至清朝皆使用臘質樣錢翻出母錢，再用母錢爲模具製作鑄型。宋以後之模具是以土炭或沙置木框中填實，再以松香或清油薰模。其後以所備之錢母百文壓於二框中形成模型，取去錢母，再灌銅、鐵漿。由於模具非以陶瓷土爲原料，又未經窯燒，故無模具流傳。⑱河南澠池宋代鑄錢遺址中，出土坩鍋、鐵錢、礦石、鐵塊，但卻無錢范即爲證明。⑲由是之觀之，鈞台窯錢范不太可能是北宋官鑄「宣和元寶」之錢模。

北宋盜鑄風氣頗盛，所鑄錢拙劣不堪，拙劣的錢模亦有可能是盜鑄所用。然宋代銅錢之使用並不只於宋代，金、元時期仍在市場上流通，甚至元朝政府在嚴禁不成後亦曾明令恢復歷代古錢之流通。⑩在對外貿易上宋錢亦頗受歡迎，日本在鎌倉幕府（1192-1333）時商業興起，急需便捷交易媒介以利行商，故自中國輸入大量銅錢，新安沉船中錢幣出土以幌計即爲證。⑪私鑄北宋錢幣並不限於北宋，至金元皆有可能。假設此錢模爲北宋時盜鑄所用，然其出現在燒製「官窯」鈞瓷、管理嚴密的官窯場，且利用官窯鈞泥爲原料，豈不怪哉？此模爲1964年在圖3E處由某農夫採集而得。位置上雖接近窯燒廢棄品集中的D區，然並無相對地層關係以資比對，不足以對窯址時代產生證明作用。其所附帶訊息只是告訴我們：鈞台窯對「鈞瓷陳設器」之胎土與釉料之管理並不嚴密，當地人甚至可取之用來仿造錢幣。在所謂「官窯」中亦可燒製盜鑄所需之錢模，反足以讓人懷疑其爲官窯之可能性。

最有趣的是，馮先銘先生於1980六月十四號在Ashmolean Museum 陶瓷研討會中堅決肯定鈞瓷陳設器是北宋瓷器，然而他所提出之時代證據爲「鈞瓷陳設器上的徽宗時銅錢印跡」。（"a mark impressed into the body of a Numbered

⑱ 陳尊祥、華覺明、張宏禮，〈宋代鐵錢鑄造考略〉，《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2期（1989年），頁123-124。

⑲ 趙青雲，〈河南澠池發現宋代鑄錢遺址〉，《考古》，1960年6期，頁15。

⑩ 溫玉玲，〈宋元時期銅錢外流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頁12。

⑪ 溫玉玲，〈宋元時期銅錢外流之研究〉，頁94，99。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Jun piece that reproduced a Huizong coin”）。⑫其時已在鈞台窯報告出版後五年，「錢模」照片尚未曾發表之前。⑬馮氏稱之爲「錢印」，顯然是對報告上判斷之有意訂正。然若爲一塊鈞泥上之北宋錢印，則對紀年毫無幫助，因爲錢印之存在與錢幣之存在意義相同，而元代紀年墓中也有出現北宋錢幣者。故馮氏說「鈞瓷陳設器上的徽宗時銅錢印」。⑭

C. 鈞台窯出土瓷器

鈞瓷陳設器據說大部分出土於前述13x8平方公尺大小之圖3D區之小坑中，幾全爲破片。在一號窯址附近亦發現陳設器碎片。尾隨「北宋官鈞」說，部分學者對此批碎片之解釋爲：其爲瑕疵品，不符入宮標準，故擊碎埋入土中以免外流。然檢驗這些碎片即知，在釉色方面雖有較不成功形成兔毫網狀之顏色斑雜者（圖28），亦可見釉色均勻天藍純淨者（圖29），未必不如今博物管所藏品。再說，其所謂在一號窯亦發現花盆破片，用以支持一號窯燒「官鈞」之論點，本身即爲「廢品埋坑」說之反證。既嚴格規定「廢品埋坑」，爲何又將之隨手丟棄在窯爐邊？

窯址報告中雖提及出土陳設器有「葵花、海棠、六角、方形、長方形花盆及承盤，還有出脊尊、斂口尊...」等⑮不過窯址出土出脊尊從未發表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展覽室亦未展出，實物狀況難以瞭解。其它碎片圈足無釉處上褐色鐵汁，器底上透明釉，並刻漢字數字（圖30）。

除了鈞瓷陳設器以外，鈞台窯亦產日用型鈞瓷（圖31）。出土地點大多在前述13x8平方公尺大小之圖3D區土層。至於A、B、C三窯中是否有特定某一窯只產陳設器型、某窯特產日用型鈞瓷，或混合生產並不清楚。D區土層與埋鈞瓷陳設器之坑之間的相關位置或先後關係亦不明。

⑫ Brian Morgan, “A Search for the Earliest Ming Style,” *TRANSACTIONS OF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45 (1980-81), p. 50.

⑬ 據筆者所知，錢模照片目前只曾出現在李輝柄，《中國陶瓷全集：鈞窯》（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頁149，圖152。與同氏，《宋代官窯瓷器》，頁51。

⑭ 馮氏在另一篇文章中則提及在鈞台窯發現的錢紋爲「印在匣缽上的『崇寧通寶』」，說法紛亂令人不解。見〈宋代瓷器發展的幾個問題〉，收在《馮先銘中國古陶瓷論文集》，頁286。不過馮氏於1985年《三上次男博士壽辰紀念論文集》刊登的〈有關鈞窯諸問題〉則一改以前說法，認爲出土的是「宣和元寶方形錢範」。見《馮先銘中國古陶瓷論文集》，頁291。

⑮ 趙青雲，〈河南省禹縣鈞台窯的發掘〉，頁58。

自3D區土層曾出土一鈞瓷碗（圖32），腹部渾圓，小圈足，施釉直至圈足邊。釉色天青滿部棕眼，發現時已殘破。其與河南方城窖藏碗（圖33）⑯及長葛石固窖藏碗（圖34）⑰胎釉器形特徵相似，應爲同一時期之產品。方城窖藏與石固窖藏之鈞瓷皆因品質精良而被定爲北宋產品，然而方城窖藏豆青釉碟與嵎城縣金代窖藏鈞瓷碟相似，⑱石固窖藏又出土金代常見之六扳釜與三足鐵鏊，⑲時代或許不早至北宋。亦出現如圖35之斂口碗，腹部斜收，小圈足微外敞，施釉不及底，形式與大同元代紀年墓（1298年）中出土鈞瓷碗（圖36）相同。其底部帶旋痕與斜刀修足之入刀痕，圈足面經削修，形成內緣高於外緣，以內緣著地之修足法（圖37）亦可見於其它元代鈞瓷之圈足部。圈足內部上釉，然釉並不平鈞覆蓋整個底部，而像是滴一大滴釉在上面，其作用或在掩飾乳突，或是一種底部上滿釉之簡化，習慣上或概念上要跟隨前代精製之標準，然而或因大量生產而聊備一格、草率了事。此外更有磁州窯系高足杯（圖38），釉色黃褐，顯示此窯區燒窯期延續相當長，金元皆存。鈞台一號窯窯爐附近除有鈞瓷陳設器破片外，發現磁州窯系高足杯（圖39）亦支持此說法。

2. 傳世鈞瓷器底漢字號碼之謎

鈞瓷陳設器底部漢字數字的意義一度頗多爭議。有人認爲它代表顏色，⑳有人認爲它代表大小，亦有各器型間配對記號㉑、與大量生產時顧客

⑯ 劉玉生、馬儷鵬，〈河南省方城縣出土一批宋代瓷器〉，《文物》，1983年3期，頁92-94。

⑰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葛縣石固發現窖藏鈞瓷〉，《中原文物》，1983年4期，頁109-110。

⑱ 陳家本，〈嵎城縣蘭梭鎮出土一批金代窖藏文物〉，《北方文物》，1990年4期，頁30-32。

⑲ 遼金元遺跡皆曾出土帶扳釜，而以金代最多。出土地點大約在中國北方的吉林、甘肅、內蒙、山西、及北京附近等處，似爲北方民族習用之物。除河南石固「北宋」窖藏出土六扳鐵釜外，不見其它北宋遺跡出土。

⑳ 如江浦寂園叟提到：「珠紅二色以一三五七九單數爲號碼，青藍二色以二四六八十雙數爲號碼。」見《陶雅》，收在《陶瓷譜錄》，頁289。

㉑ 佚名，《南窯筆記》，收在《陶瓷譜錄》，頁35：「有一二數目字樣於底足之間蓋配合一副之記號也。」馮先銘則認爲此看法只適用於花盆及盆托，但不合於出脊尊、渣斗式花盆、鼓釘洗等器。見〈鈞窯與鈞窯系〉，收在《馮先銘中國古陶瓷論文集》，頁2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用以訂貨用等說法⑫。歷年來嘗試解開漢字號碼意義並企圖證明「數字越大器物越小」的看法之學者不在少數。早在1919年S.C.Bosch Reitz即提出此說。⑬1946年George F. Lee利用比對、整理鈞瓷陳設器尺寸與刻號之方式證明Reits之看法爲眞。⑭1982年馮先銘再次處理此問題，並導出：「若花盆與承盤的底與足有內刻兩個字的話，底部數字代表口徑大小編號；刻於足內是配對編號。」之結論。⑮稍後的王莉英合併台北及北京兩故宮之資料，檢驗「數字越大器物越小」之說，並反對馮先銘對於足際刻字之解釋，認爲足上刻號之出現是爲防底部刻號不清晰。⑯

大致上「數字越大器物越小」的看法確實無誤。以渣斗式花盆爲例（參見表一編號15-36），渣斗式花盆之高度每小一號大約昇高0.9公分左右，而口徑、足徑亦隨比例加大。每一漢字號數內，各器高度雖不盡相同，然而差異均在0.5公分左右，或可算是丈量時之誤差。然而由表一亦可得之，並非每一件器物之大小與其號數關係皆如此規律，如表一編號32之二號渣斗式花盆，爲何單獨地打破應有高度範圍，比其它二號花盆矮小？此種不規律現象並非只出現在渣斗式花盆，幾乎每一種陳設器皆存在（見表一打★號者），而在爲數最多之鼓釘洗看得最清楚。在規律狀況下，鼓釘洗之大小號數分配可能爲下：

⑫ Margaret Medley, *THE CHINESE POTTER: A PRACTICAL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pp. 118-122. 荊子久亦認爲帶號碼者爲訂製器，是爲精品。而大量燒製之客貨則盡無碼矣。《鈞窯考證》，收在《說陶》，頁 770-772。

⑬ S. C. Bosch Reitz, "On The Numbers in The Base of Chun Ware," *BULLETIN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vol. XI, no. 8 (1916), pp. 173-174。

⑭ George F. Lee, "Numbered Chun Ware," *TRANSACTIONS OF ORIENTAL CERAMICS*, vol. 21 (1945-46), pp. 53-64.

⑮ 馮先銘，〈鈞窯與鈞窯系〉，收在《馮先銘中國古陶瓷論文集》，頁279。

⑯ 王莉英，〈談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官鈞"瓷器〉，收在《河南鈞瓷汝瓷與三彩》（北京：紫禁城，1985），頁32-39。

表二　鼓釘洗之大小號數可能之相對尺寸

表一編號	器　型	高度（公分）	口徑（公分）	足徑（公分）	漢字號碼
48	鼓釘式洗	6.8	17.2	12.5	八
53	鼓釘式洗	6.98	18.8	?	七
62	鼓釘式洗	7.5	20	14.4	四
68	鼓釘式洗	7.9	21	15	三
71	鼓釘式洗	8.5	22.2	16	二
77	鼓釘式洗	9.4	23.5	19.5	一

然而縱觀表一中鼓釘式一號洗（表一編號76-93）之口徑長度，其範圍卻小到22公分大至30.2公分，差距之大比表二所列「規律」狀態下鼓釘洗八號（17.2公分）至一號（23.5公分）口徑之長度範圍猶有過之。既然以漢字號碼表示大小，爲何又有如此多不合「規格」之器物存在？

若檢查表一之一號鼓釘洗可發現，口徑或高度「不合規格」者在漢字刻號⑰與底部支釘等處均有異於「合規格」者。它們有的無刻號（編號83）、有的刻號不在底部而在足部（編號86）、有的除號數外加刻「大」字（編號91）。⑱Baur Collection中一號洗（編號76）尺寸比一般一號洗小，底部支釘圈也特別小而集中（圖40）。北京故宮藏一號洗（編號88，圖41）底部支釘大而密，與鈞台窯出土鼓釘洗之細支釘痕相差太大（圖42），且支釘數量多達三十五個，支釘圈內釉的厚度幾與器身相同，漢字號碼刻在厚釉上，字劃輕薄不深達胎體。除了器身大小較一般一號洗巨大外，在胎釉特徵上亦似與「合於規格」者不屬同群。

圖43是合於尺寸與數碼對應規律之二號鼓釘洗（高8.5公分，口徑22.5公分），現藏於北京故宮。將之與同爲二號但「不合規格」之洗相比較（圖44，表一編號75），則知後者器身高度較高、足部角度陡直且較長。近足部之一圈鼓釘因爲器腹彎曲度縮小而幾與近口沿之鼓釘在同一平面上，觀者可輕易見

⑰ 長谷部樂爾曾提及鈞瓷陳設器底部漢字爲壓印，見〈中國陶磁展に因んで--宋代の陶磁を中心にして--〉，《出光美術館館報》，no. 57 (1987)，頁25。不過就如表一所示，被認爲是壓印上者只有Freer Gallery兩件與東京博物館一件，大部分漢字數碼皆被認爲是刻製。

⑱ 另外，鼓釘洗亦出現底、足均刻漢字數字者，如表一鼓釘式洗編號19、73、75等，尺寸皆大於規律狀態下應有之大小。

臺灣大學博物館 期刊資料庫

到兩圈鼓釘。不論是鼓釘或下方之弦紋都特別凸鼓而清晰。與此相近者筆者還曾發現六號（圖45、表一56）與七號（圖46），這類鼓釘特別明顯之洗可能爲不同時候的製品。若考慮前述高濂所謂：

「諸窯假鈞州紫綠二色洗與水中丞多甚...」⑬

再將今日博物館、拍賣會中出現鼓釘洗數量遠超過鈞瓷陳設器其它器形之現象一併考律，則或許在現存陳設器鈞瓷並不只是一時、一地之產品，而陳設器尺寸是否合於「號數規格」可爲區分鈞瓷陳設器祖型群與後仿群之重要線索。

即便如此，相同大小、相同形式鈞瓷陳設器並非毫無疑問地屬於同一時代產物。如圖47之六號出脊尊（表一8）與圖48之六號出脊尊（表一10），雖然在高度、口徑、足徑皆可合理地劃入六號器範圍，底部釉法（圖49、50）也相似，皆上天青色厚釉而於近圈足處釉薄呈褐色，但在器形上圖47頸部較長，由頸至喇叭狀開口之散開速度較緩，而口部外翻部分較多。二者出脊處雖相仿且脊之長度相同，但圖48之脊明顯較粗寬。另外，上海博物館五號出脊尊（圖51表一編號12）尺寸合乎規律且形狀與故宮出脊尊（圖48）相仿，其底部卻只上薄薄的護胎釉（積釉處可見與器身相同之天藍色），且底部鑽有一孔（圖52）。若說此三尊爲同時代產物，其底部之精粗差異實令人不解。

渣斗式花盆方面，由圈足的形狀與釉質可將之略分兩種：第一種圈足呈簡單喇叭狀向外伸展，圈足上之釉顏色暗澹，釉的邊緣不整齊。台北故宮三件具此式圈足花盆皆「合於規格」（七號：圖53表一19；六號：圖54表一20；一號：圖55表一33），然三者底部卻不盡相同。七號盆底部均勻地上透明釉，釉厚處呈天藍色（圖56）。六號盆底部不均勻地上乳濁釉，釉厚處呈天藍色，此乳濁釉下刷褐色鐵汁（圖57）。一號盆底部只非常粗心大意地塗褐汁，許多地方不被覆蓋（圖58）。鈞台窯出土鈞瓷陳設器碎片中，此三種底部釉法皆可見（圖42、59）。第二種圈足即如出光美術館所藏者（圖60，高15.7公分），喇叭狀足向外伸展並不簡單圓順，具轉折角度。出光渣斗花盆圈足較高（與圖54比較），腹部圖出角度較尖銳，最大徑提高靠近頸部。頸部拉長，喇叭口外

⑬ 高濂，《遵生八牋》，頁752。

撇較明顯。似與一般「合於規格的」渣斗花盆不同。類似情形在各器形皆存在，即同號數器或多或少都稍帶一點兒不同，令人苦惱。

就筆者所收集之資料看來，處理此類鈞瓷所面臨之另一個困難在於某幾種器類，如長方形花盆及承盤、六方形花盆及承盤、海棠式花盆及承盤現存數量相當少（表一94-112），少到甚至不足以規納出其漢字號數所對應之尺寸，從而難以判斷其時代是否與祖群同時。即使如此，爲確定鈞瓷陳設器始燒年代，首先仍須將原始祖群與後仿者區分開來。或許將一批「合於規格」之陳設器集中觀察以瞭解其胎釉特徵是區分此群的第一步。初步判斷，此群共同特徵爲：釉色多爲內部天藍外部藍紫窯變，並無如圖45之豔紅。此與鈞台窯出土陳設器碎片的釉色特徵相同。⑭釉面常見蚯蚓走泥紋與深淺二色融合時產生的斑點或網狀色群（如圖61）。

3. 鈞瓷陳設器之時代釐測

大致而言，鈞瓷陳設器北宋說之核心論點除前所處理的鈞台窯址「雙乳狀北宋實驗官窯」及「宣和元寶錢模」外，立足點在於鈞瓷出脊尊與汝窯出脊尊器形之相似，與兩者器底皆具北宋宮廷建築名稱「奉華」之銘文。這種推論是基於十三式陳設器鈞瓷皆爲始產於同時代之同群器的想法，將一式之時代擴大等同於十三式之時代。筆者雖然可接受在鈞瓷陳設器始燒時各式皆備的先驗想法，仍認爲儘量將每一種器形可能之出現時代兼及隨時代所產生的器形變化重新確認是不可缺少的。本節擬由出脊尊開始，逐一討論各器形之初始可能年代。

A. 出脊尊

被用以印證鈞瓷出脊尊年代之汝瓷出脊尊（圖62）現藏於台北故宮，據說是目前僅存汝窯尊孤例。其腹部圓鼓、出脊細而帶凹凸，雖同名爲出脊尊然與鈞瓷在形狀上相距太遠，事實上難以做爲兩者時代比較之佐證。此尊底部（圖63）支釘痕較「芝麻掙釘」大，支釘露胎處顏色較香灰色潔白許多，

⑭ 根據窯址報告，此處鈞瓷主要釉色有「天青、豆青、月白、紫紅、碧藍、米黃諸色。」見趙青雲〈河南省禹縣鈞台窯的發掘〉，頁58。筆者至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所見碎片中亦無紅色。今博物館常見　紅色菱花式洗有可能不屬於此群。

臺灣大學藝術 期刊資料庫

且胎質較堅硬，與傳世汝窯特色有相當的差距。脊部釉下塗鐵汁欲使其釉薄處產生類似金屬色澤的設計亦不見於其它汝窯器，應爲後仿而非北宋汝瓷，故此尊並未具有如馮先銘所謂做爲北宋時代標的器之資格。⑬至於「奉華」銘，雖在汝瓷其它器底亦可見，然而鈞瓷「奉華」銘卻從未發表過，難以得知眞實狀況。⑭馮先銘比對台北故宮汝瓷出脊尊與傳世鈞瓷出脊尊底部之「奉華」，認爲二者字體筆法如出一人之手，進而認爲鈞瓷陳設器皆屬北宋產品。⑮既然汝瓷出脊尊非北宋物，據此而得的推論即屬無效。

鈞瓷出脊尊器形明顯仿自銅器。中國瓷器造形一直與其它材質之器有密切之互動關係，在南宋（金）、元與明初，銅器造形影響陶瓷等器物造形特別深遠。⑯因此探討銅出脊尊器形演變在「鈞瓷出脊尊之時代」議題中顯得甚爲重要。

出脊尊屬觚形尊的一種，流行於殷後期至西周早期之觚形尊有無鴒（圖64）、雙層鴒（圖65）與三層鴒（圖66、67）三型，其三層鴒之尊除如圖66般最上層鴒短小外，亦有如圖67上層鴒自口沿連至頸腹之交者。鴒越大層數越多者通常器身花紋較多、器體也較大。即鴒的大小相關著尊器等級之高低。⑰腹部與頸、足銜接處雖較狹窄凹陷，但腹部並不特別凸出。腹部縱有較渾圓或較方整之不同形態，但大致上整個尊體略如筒狀，不過份強調器體三段之區隔。

宋代所仿之出脊尊大致亦如此。圖68宋代銅尊腹鴒與足鴒位置相交錯，鴒部修長纖細而光滑，腹部雖圓渾但不突兀於器身弧度之外，足部將圈足減去只留喇叭狀口。流暢之韻律洋溢。另一件藏於台北故宮，十二世紀早期之

⑬ 馮先銘，〈記1964年在故宮博物院舉辦的“古代藝術展覽”中的瓷器〉，收在《馮先銘中國古陶瓷論文集》，頁81。

⑭ 據說鈞瓷出脊尊的另一銘文爲「省符」，其意義仍不爲人所知。見中國陶瓷史編委會，《中國陶瓷史》（台北：胡氏，無出版年），頁238。

⑮ 馮先銘，〈記1964年在故宮博物院舉辦的“古代藝術展覽”中的瓷器〉，收在《馮先銘中國古陶瓷論文集》，頁81；同氏，〈河南省臨汝縣宋代汝窯遺址調查〉，《文物》，1964年8期，頁26。

⑯ Rose Kerr, “The Evolution of Bronze Style in the Jin,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ORIENTAL ART*, vol. 28 (1982-1983), no. 2, p. 146.

⑰ 林巳奈夫，〈所謂饕餮紋表現的是什麼〉，收在樋口隆康編，《中國考古學研究論文集》（東京：株式會社東方書店，1990），頁138-139 。

銅尊則仿三層鴒式觚形尊（圖69），⑱鴒部將商周代之齒狀誇張化，使之凹凸變化加劇成波浪狀。前述「汝窯」出脊尊鴒部即意在模仿此式。此尊喇叭狀足簡單外敞，器身三段區隔亦不明顯。瓷器方面，與圖68對應者有穎川美術館的青瓷出脊尊（圖70）。第二層脊位置改變調合了一、三層脊之對齊，脊成了分格小區域的工具，使器身流暢之餘仍帶節奏感。其腹部渾圓膨脹但與器身線條仍呈一體，未見尖銳轉折；底部圈足小於喇叭足口。今博物館藏有一批被定爲南宋末至元初（13-14世紀）之龍泉青瓷及十四世紀初（1323年）新安沉船⑲所載二龍泉觚形尊在器腹、器身線條質感與足部特色皆與穎川青瓷尊相類似。

元代銅製觚形尊實貌雖然不爲人所知，新安沉船中發現的銅觚變貌（圖71）卻爲我們指引其演變方向。首先是腹部加大呈鼓狀，上下沿折角尖銳，腹足間以一較細部分區分。足與器身銜接並不圓順，亦見銳角。此項轉變亦可見於十四世紀青花陳設器（圖72），各部銜接處轉折明顯，頸、腹、足三者分段清晰，圈足仍較喇叭口小。

明初觚形尊雖不知其詳，然若參考San Francisco Asia Museum藏景泰（1450-1456）銘銅胎掐絲琺瑯觚形尊（圖73）則可發現其足部喇叭狀足壁較新安銅觚短小，喇叭狀足徑與圈足徑等長，足部特色與傳世鈞瓷尊相似。此後正德、嘉靖、萬曆所製出脊尊（圖74、75、76）喇叭狀足的部分越來越短，上所貼附之脊條也漸小條，原有四副出脊變成兩副。腹、足間凹陷部分下緣加寬、角度趨緩，第一層脊條位置爬昇。萬曆時腹足間較細之聯接處拉長變成一弧狀喇叭足，原應屬喇叭狀足壁與圈足部分被製成二小圈裝飾，下再加一圈足。足部脊條變爲「脊釘」。這些現象皆因仿製時不明其原有部分之意義而形成。

反觀圖47合於規格之出脊尊，脊部寬度與圖80明初出脊尊相當。喇叭狀足壁高度不短於景泰尊之高度。這樣的喇叭狀帶圈足之形式亦可見於四川元墓出土銅壺（圖77）。由上述比對可知，鈞瓷出脊尊可能始創於元代後期或明

⑱ 此尊台北故宮之定年較早，然而William Watson檢視其文飾，認爲應是十二世紀時之仿製品，見William Watson, “On some Categories of Archaism in Chinese Bronzes,” *ARS ORIENTALIS*, vol. IX (1973), p. 6.

⑲ 新安沉船年代見龜井明德，《日本貿易陶磁史の研究》（京都：同朋社，1986），頁182。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初，即十四世紀後期。⑱

B. 渣斗式盆

渣斗式花盆器形之源頭至少可溯至南宋龍泉盂。四川省南宋窖藏出土青瓷盂（圖79）。圈足高而直，腹部概與頸部佔同等高度，頸部斜直，口沿外翻。頸腹接口徑大於足徑。十四世紀初新安沉船內的龍泉盂（圖80）頸部加長，口沿外侈部分較多，使頸部線條稍帶弧度。十五世紀初宣德銘青花盂（圖81）腹部最大徑提高接近頸部，頸肩接口處變得小於圈足而口部外侈加大，強化頸部曲線彎弧。圈足外撇。鈞瓷花盆（圖55）腹部最大徑在腹部中部稍上方，頸部曲線不及宣德花盆彎，但弧度大於新安青瓷。腹頸接口大於足徑但圈足外撇。特徵居於新安與宣德盂之間，可見製造時代亦介於1323與宣德（1425-1434）間，即十四世紀至十五世紀間。

十六世紀以後此種花盆頸部高度拉得更長，如嘉靖銘器（圖82）與萬曆定陵出土尊（圖83）。

C. 仰鐘式盆

元代1323年新安出土龍泉窯青瓷盆（圖84）口沿爲一圈波浪紋，器身腰部內凹底部膨隆。鈞瓷仰鐘式花盆（圖85）口沿外張角度較小，器身彎曲變化和緩。圖86爲正德（1506-1521）銘法華仰鐘式盆，器形較鈞瓷拉長許多，器身弧度變化更少。雖然找不著十四世紀末十五世紀初之標的物以資比較，但至少由器形演變可知鈞瓷仰鐘式盆不早於十四世紀初，亦不晚於正德時期。

D. 鼓釘洗、六方盆、海棠式盆及其它

衆所皆知，鼓釘洗最盛行於元代，而以龍泉最爲常見。南宋時已存在鼓釘洗器形，出土於長沙窯銅官頭沖南宋窯址⑲之鼓釘洗（圖87）器身圓滑無

⑱ Christie's拍賣目錄曾出現一件日用型鈞瓷釉之小尊(圖78)，其釉色類似元代鈞釉，器身比例亦與鈞窯出脊尊相似，然此器高度只有11.7公分，似不合實用。近年拍賣市場常出現超小型天目茶碗、超小型鈞碗，胎釉雖似眞然爲仿品，此尊或屬此類。見Christie's,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LONDON, MONDAY, JUNE, 6, 1994* (London: Christie's, 1994), plate 103.

⑲ 黃綱正，〈長沙銅官窯頭沖宋代窯址調查〉，《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1984），頁246-250。

特殊之凹凸，鼓釘排列不整齊。十三世紀末龍泉鼓釘洗（圖88）、大約同時之哥窯洗（圖89）與水吉建窯宋末元初地層出土洗（圖90）開始產生唇口，器壁下方亦多出一圈微微凸出，其上置鼓釘，意在強調鼓釘使之明顯化。鈞瓷鼓釘洗圓弧器身上具大唇口，唇口下方之弦紋規劃了鼓釘位置，形式較上述洗更複雜化，恰好可放入十四世紀器形演化之序列。

方形花盆與承盤雖無紀年物可資比較，然自十二世紀末金元以來，類似器形出土頗多，皆爲陶製品。如四川蘆山⑳、樂山南宋墓㉑、洛陽王述墓（1350年）㉒、北京后桃園元代居住遺址㉓、元賽因赤答忽墓（1365年）㉔出土之長方形香爐；閻德源墓（1190年）㉕、濟南元墓（1293年）㉖與王述墓（1350年）之方形香爐分別可被視爲鈞瓷方形承盤與花盆之前身。從兩類器演變相似點告訴我們，十二世紀時口部爲簡單之直口，十三世紀口沿開始加一圈凸出，板沿形式十四紀開始流行。而扳沿部分四角內凹，在器身內緣相對外凸，並產生脊稜的形式亦可在1315年以後之元代窖藏銀盤上看見。㉗

此外，墓中出現與鈞瓷相彷器形均爲底部無出水孔之「香爐」亦爲值得探討的有趣問題。目前在各博物館中所藏之「傳世哥窯器」除上述鼓釘式洗外，還有渣斗式爐（圖91）、六方形爐（圖92）、及海棠式爐（圖93）。多數在器內有細支釘痕。高度皆低於10公分。傳世哥窯之年代仍頗有爭議，非筆者現在能處理。然在元、明代墓葬哥窯出土日多的今天，㉘此群「香爐」之出

⑳ 陳華，〈蘆山現發現宋代三彩器物〉，《四川文物》，1995年1期，頁57，圖1。

㉑ 樂山市文管所，〈樂山宋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93年6期，頁54，圖1之6。

㉒ 洛陽市博物館，〈洛陽元王述墓清理〉，《考古》，1979年6期，頁569，圖1之8。

㉓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處: 元大都考古隊，〈北京西條胡同和后桃園的元代居住遺址〉，《考古》，1973年5期，頁282，圖7左下。

㉔ 見洛陽市鐵路北站、編組站聯合考古發掘隊，〈元賽因赤答忽墓的發掘〉，《文物》，1996年2期，頁22-33，圖21。

㉕ 大同市博物館，〈大同金代閻德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4期，頁12，圖37。

㉖ 華東文物工作隊，〈四年來華東區的文物工作及其重要的發現〉，《文物》，1954年8期，封底。

㉗ 衡陽市文物工作隊，〈湖南衡南出土元代窖藏銀器〉，《考古》，1987年9期，圖版捌之5。

㉘ 見上海博物館，〈上海市青浦縣元代任氏墓葬記述〉，《文物》，1982年7期，頁54-59。南京市博物館，〈南京明汪興祖墓清理簡報〉，《考古》，1972年4期，頁31-33，2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安溪明墓〉，收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北京：科學，1993），頁287-288。

臺灣大學博物館 期刊資料庫

現或許可爲「南宋說」提供一些資料。圖94爲江西南宋紀年墓（1205）出土之海棠式爐。大小、形式皆與上述海棠形哥窯器相同，或許年代相近。而且此群哥窯香爐口沿部分出唇較少，不似鈞瓷陳設器之粗寬，亦無其「出稜」、「邊綠」等元代特徵，可能是南宋產品。

鈞瓷陳設器之製造以南宋特有之香爐祭器爲藍圖，將體積擴大，性質轉變爲日用陳設器。期間並加入元代以後特別受歡迎的特殊器形，即葵花⑱、菱花式花盆和承盤，爲陶瓷史掀起另一波持續久遠的仿製風潮，也帶給陶瓷史學者難解之謎。

三、小結

傳世鈞窯器最初之所以又被稱爲花器，純粹是據其底部帶水孔，大小合於栽種觀賞用花木之形式來判斷。而此類鈞瓷與北宋宮廷牽扯不清之關係起源於文化氛圍上的推測。George F. Lee在爲這群誤定爲北宋時代之鈞瓷尋找使用者時曾臆測：宋代儒、釋、道三者揉融而成的時代精神反映在表現自然的山水畫之盛行、對高古器物之狂熱與建構花園之興趣上。因此「盆栽藝術」必已被北宋宮廷所接受。鈞窯址距首府開封不遠，可能就此被選爲燒製陳設器之窯。⑲其後馮先銘因此批鈞瓷在造形和底部「奉華」銘與定窯、汝窯、官窯有共同點，認爲其爲應宮廷需要而燒製。⑳1975年趙青雲將「花石綱」與鈞瓷相連繫，並因而將鈞瓷陳設器年代定爲北宋徽宗時期。㉑其後李輝柄亦認爲宋徽宗既然大量搜括江南奇花異石，必定需要陳設器以容之，此即鈞瓷陳設器產生的社會原因與背景。㉒爾後馮先銘則提出鈞瓷陳設器是爲徽宗萬歲山種植奇花而燒，㉓此爲基於臆測的推論。中國陶瓷研究者此後逕將此

⑱ 根據HIN-CHEUNG LOVELL 之研究，宋代涉及花形之器物其花之表現均較抽像，是暗示性的。邊緣類似鈞窯菱花式器的漆器盤，應爲元代製品。在任仁發墓（1327年）壁畫即出現器邊同形之物。 "Sung and Yuan Monochrome Lacquers in the Freer Gallery," *ARS ORIENTALIS*, vol. IX (1973), p. 127.

⑲ George F. Lee, "Numbered Chun Ware," p. 59.

⑳ 馮先銘，〈河南省臨汝縣宋代汝窯遺址調查〉，《文物》，1964年8期，頁26。

㉑ 趙青雲，〈河南省禹縣鈞台窯的發掘〉，頁63。

㉒ 李輝柄，〈鈞窯的性質及燒造年代〉，頁57。

㉓ 馮先銘，〈有關鈞窯諸問題〉，收在《馮先銘中國古陶瓷論文集》，頁291。

「神話」奉爲圭臬，鈞瓷陳設器亦理所當然地被貼上「北宋官窯」標簽。然經由本文對鈞台窯址狀況之檢討、錢模作爲時代標的物正當性之否定、與鈞瓷陳設器器形比對可得知：鈞瓷陳設器不產於北宋。其時代應爲十四世紀晚期，元末明初。至於「花石綱」則與之無甚相干。㉔

㉔ 李民舉亦認爲鈞瓷陳設器製造年代應於元末明初，且「花石綱」不足爲傳世鈞瓷年代的證明。見李民舉，〈陳設類鈞瓷年代考辯：兼論鈞台窯年代問題〉，未刊稿，將發表於北京大學《考古學研究》論文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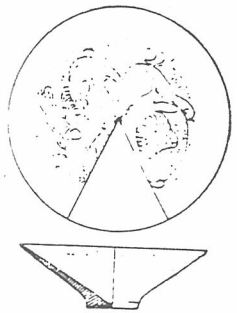


圖1 河南禹縣鈞台窯出土影青斗笠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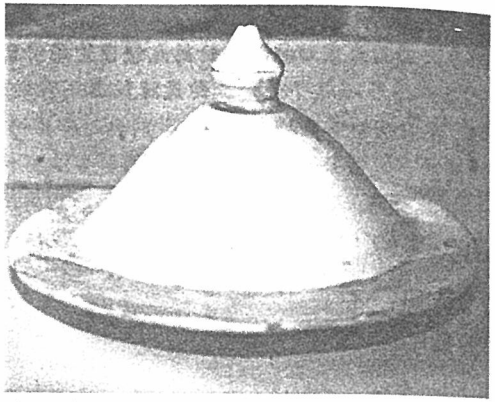


圖2 河南禹縣鈞台窯出土白釉綠彩器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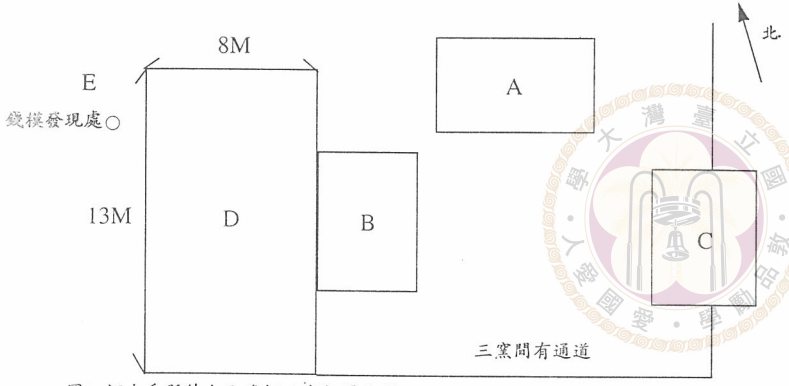


圖3 河南禹縣鈞台已發掘三窯相關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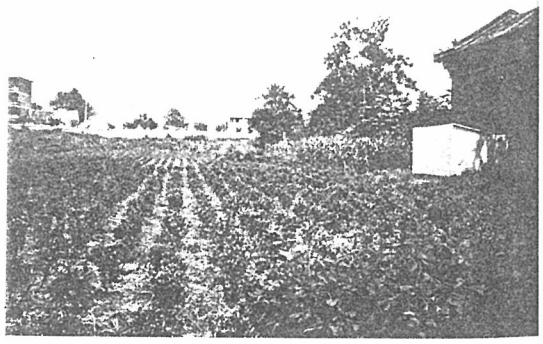


圖4 8M×13M土地現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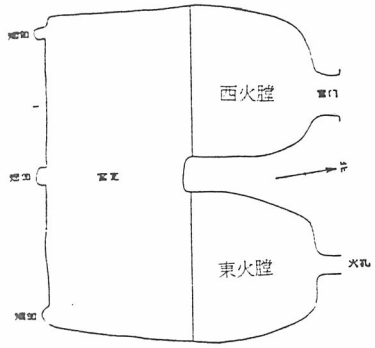


圖5「雙火膛長方形窯」（一號窯）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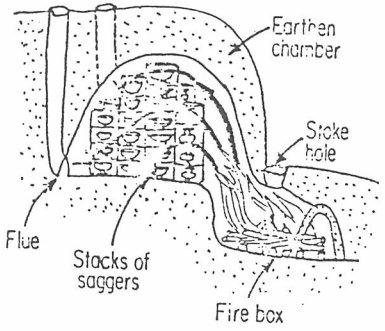


圖6 Kingery之一號窯復原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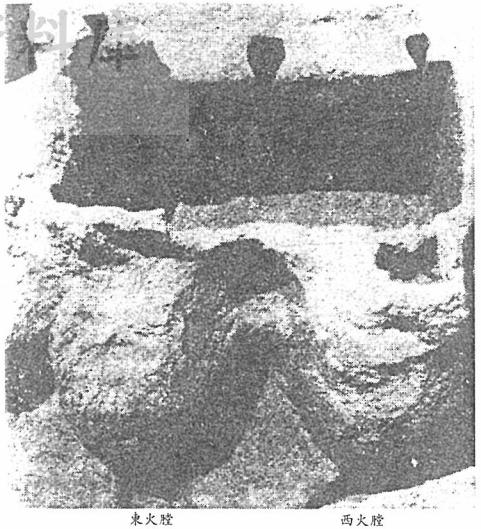


圖7「雙火膛長方形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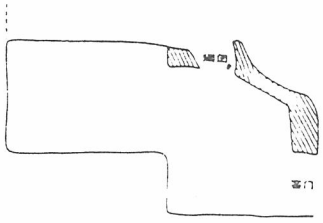


圖8 一號窯之縱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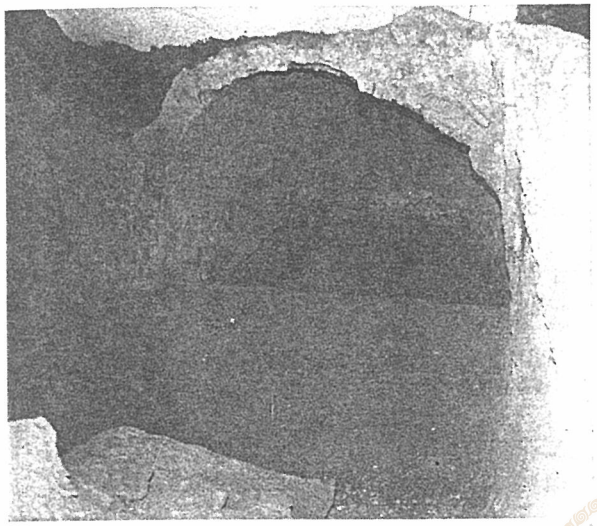


圖9 「東火膛」內側及窯床



圖10 「東火膛」之火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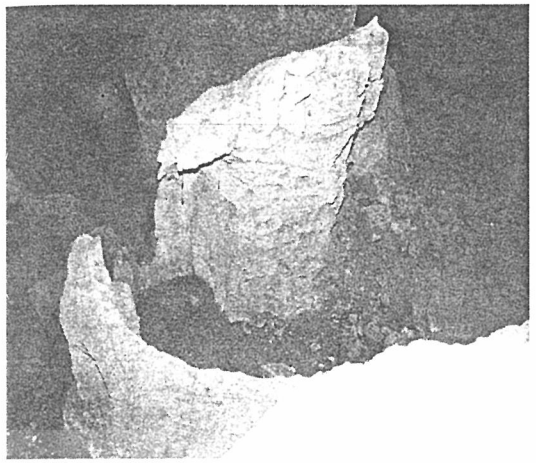


圖11 「西火膛」崩塌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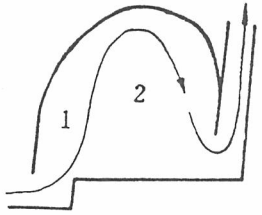


圖12 半倒燄馬蹄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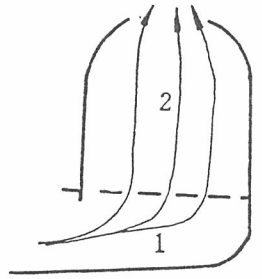


圖13 昇燄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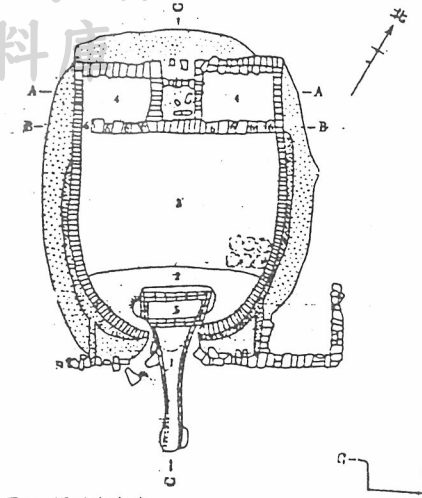


圖14 耀州窯窯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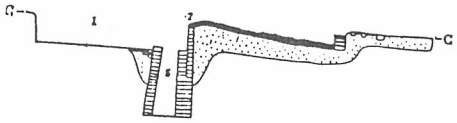


圖15 耀州窯窯爐縱剖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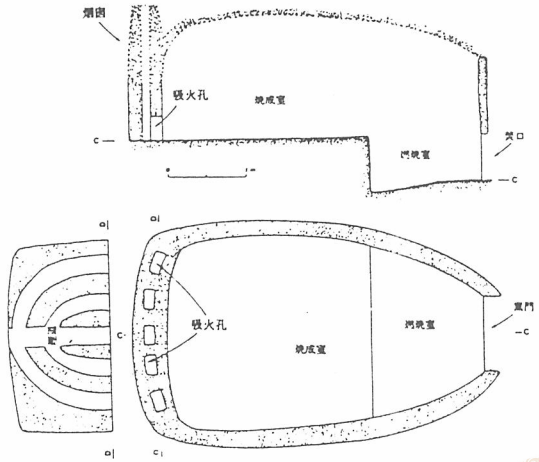


圖16 河南禹縣鈞台「單形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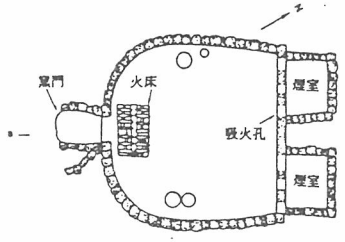


圖17 耀州窯窯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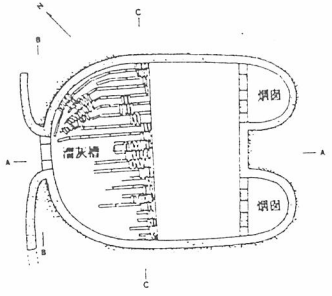


圖18 旬邑安仁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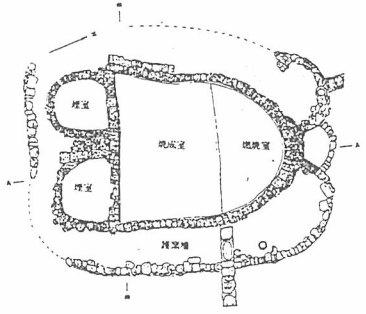


圖19 磁縣觀台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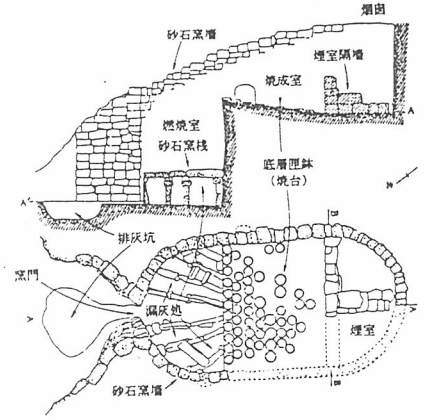


圖20 重慶鋸木灣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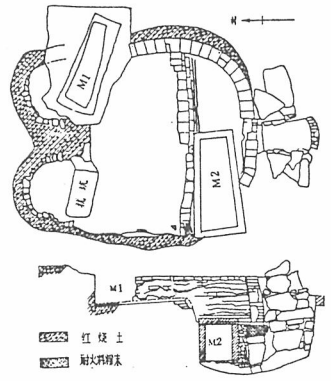


圖21 淄博市磁區金代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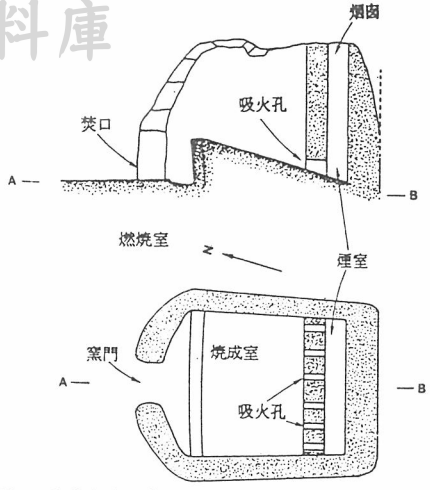


圖22 景德鎮蛋形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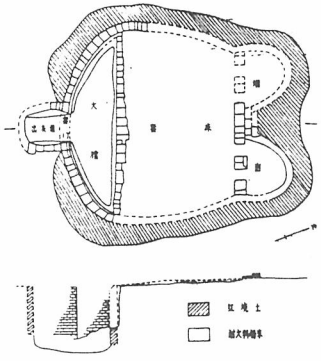


圖24 淄博市坡地金元代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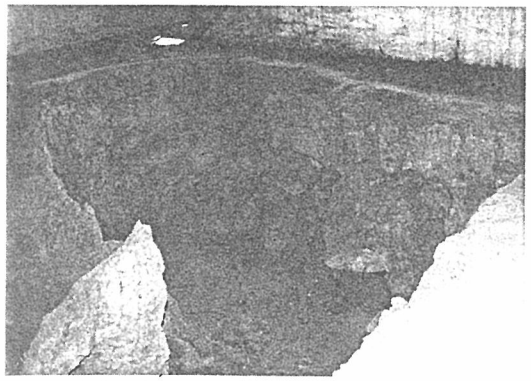


圖23 河南禹縣鈞台一號窯疊壓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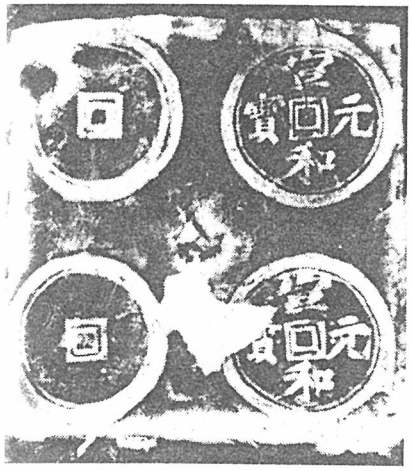


圖25 「宣和元寶」錢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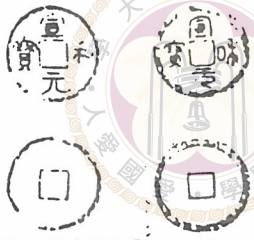


圖27 著錄所載「宣和元寶」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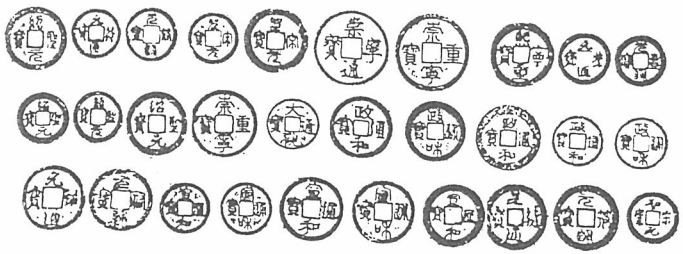


圖26 長沙高礦窖藏出土錢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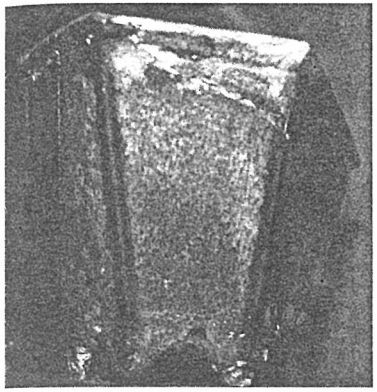


圖28 鈞台窯址D區小坑出土花盆



圖29 鈞台窯址D區小坑出土鼓釘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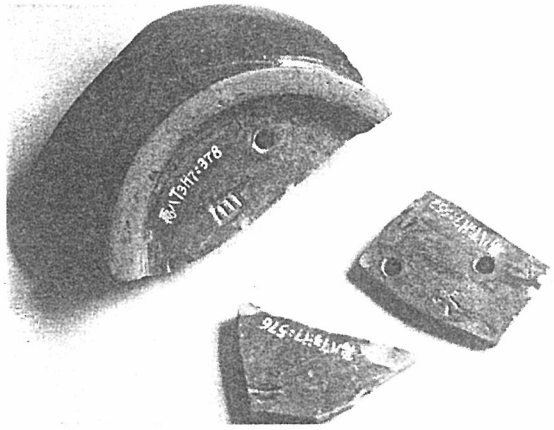


圖30 鈞台窯址出土傳世鈞瓷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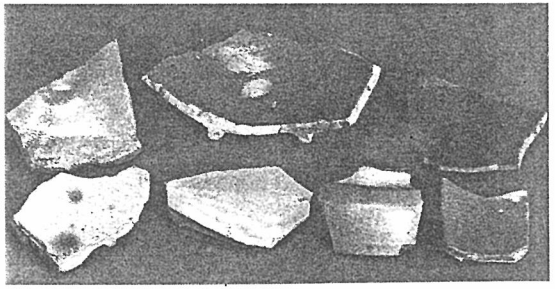


圖31 鈞台窯址出土日用型鈞瓷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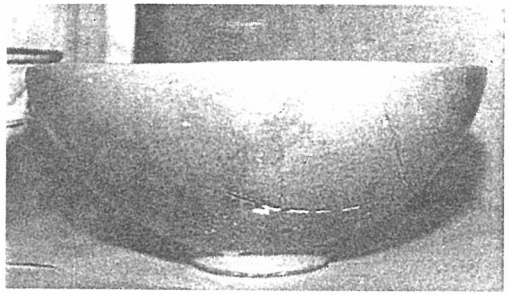


圖32 鈞台窯址D區土層出土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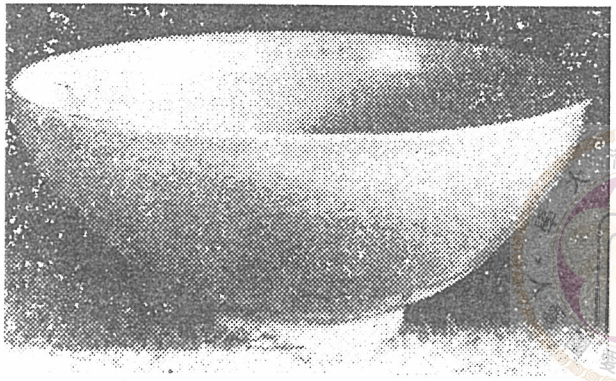


圖33 河南方城縣窖藏鈞瓷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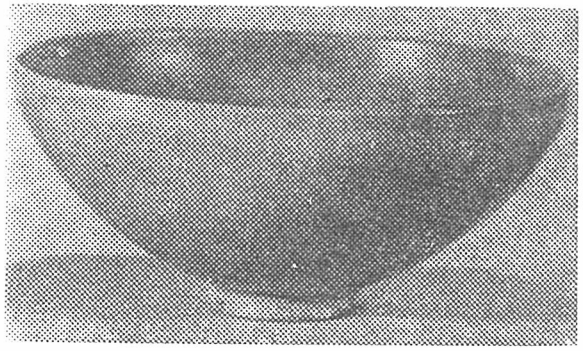


圖34 河南長葛縣石固窖藏鈞瓷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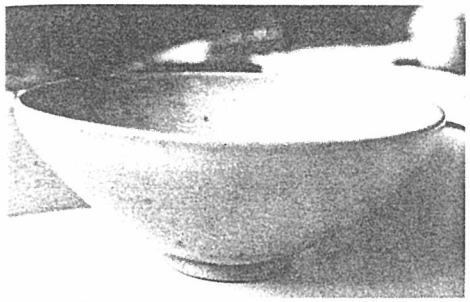


圖35 鈞台窯址D區土層出土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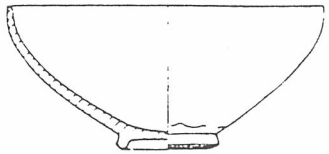


圖36 山西大同1298年墓出土鈞瓷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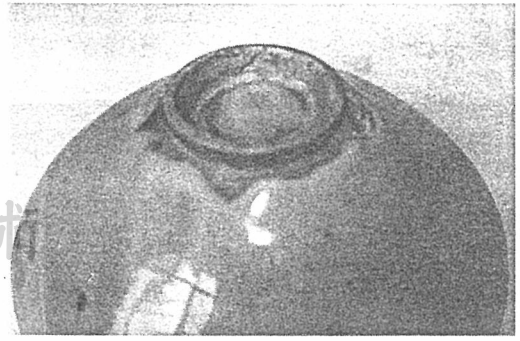


圖37 鈞台窯址D區土層出土碗底部



圖38 鈞台窯址D區土層出土高足杯



圖39 鈞台一號窯出土高足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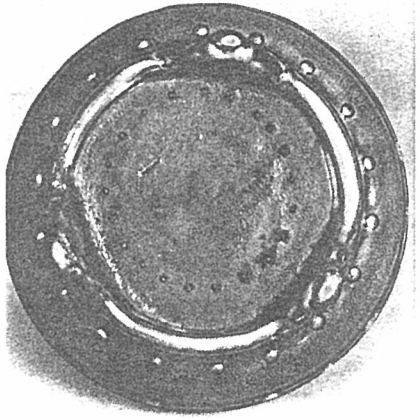


圖40　一號洗底部，Baur Col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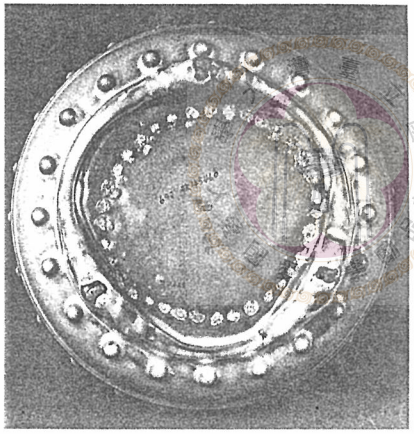


圖41　一號洗底部，北京故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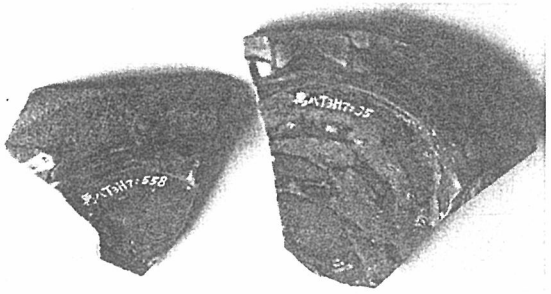


圖42　鈞台窯址出土傳世鈞瓷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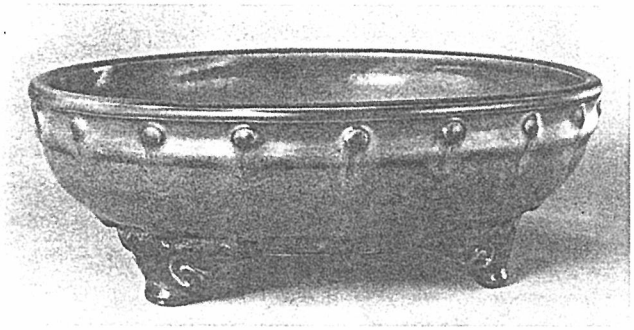


圖43　二號洗，北京故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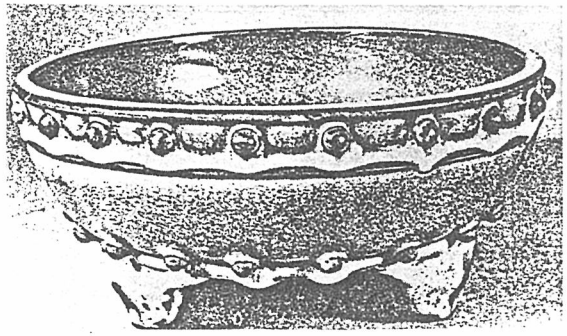


圖44　不合規律的二號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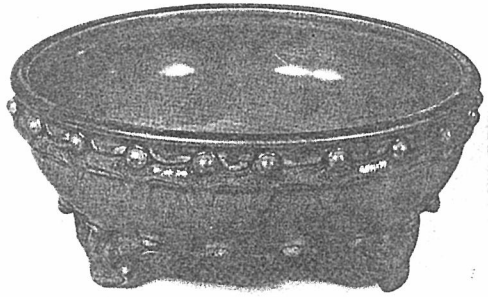


圖45　不合規律的六號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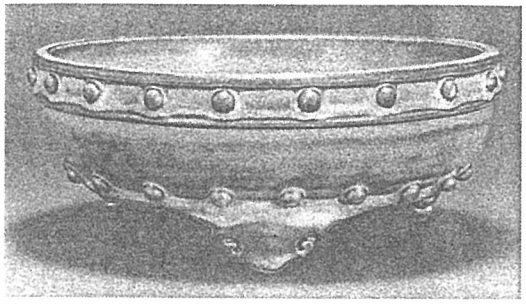


圖46 不合規律的七號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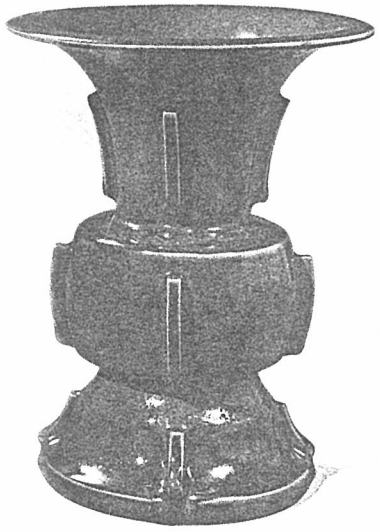


圖47 六號出脊尊，台北故宮



圖48 六號出脊尊，台北故宮



圖49 六號出脊尊底部，台北故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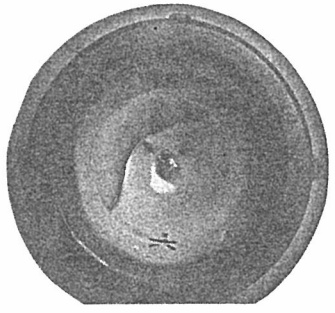


圖50 六號出脊尊底部，台北故宮



圖51 五號出脊尊，上海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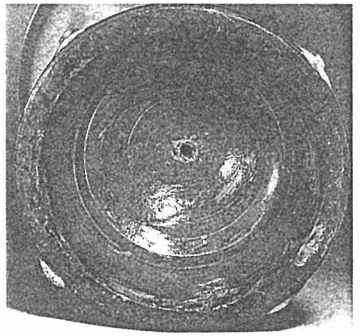


圖52 五號出脊尊底部，上海博物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3 七號渣斗式花盆，台北故宮



圖54 六號渣斗式花盆，台北故宮



圖55 一號渣斗式花盆，台北故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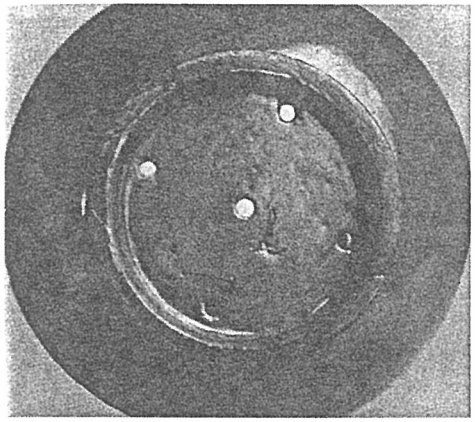


圖56 七號渣斗式花盆底部，台北故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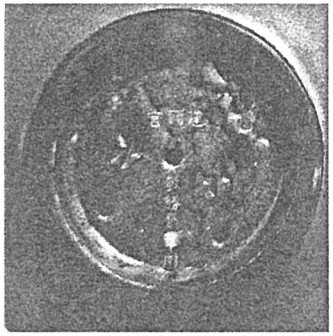


圖57 六號渣斗式花盆底部，台北故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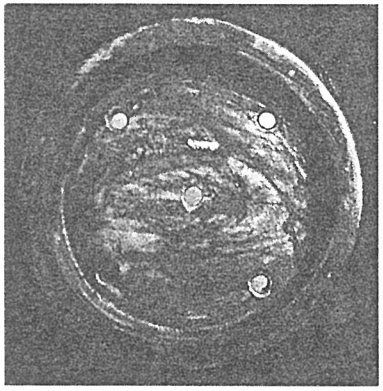


圖58 一號渣斗式花盆底部，台北故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9 鈞台窯址出土傳世鈞瓷殘片



圖60 渣斗式花盆，出光美術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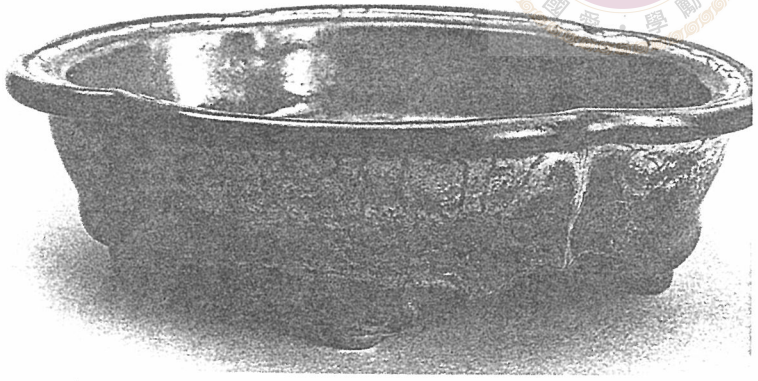


圖61 海棠式洗，上海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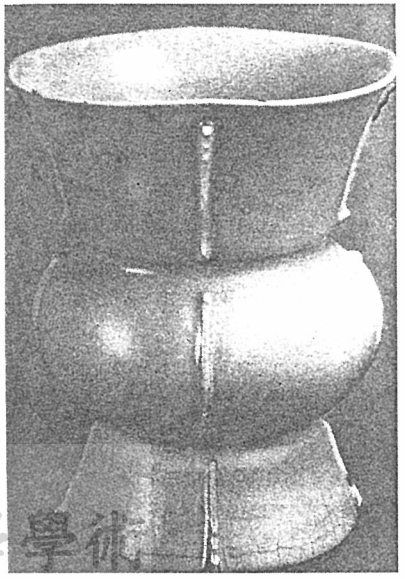


圖62 汝瓷出脊尊，台北故宮



圖64 無鋪舨形尊



圖63 汝瓷出脊尊底部，台北故宮



圖65 雙層鋪舨形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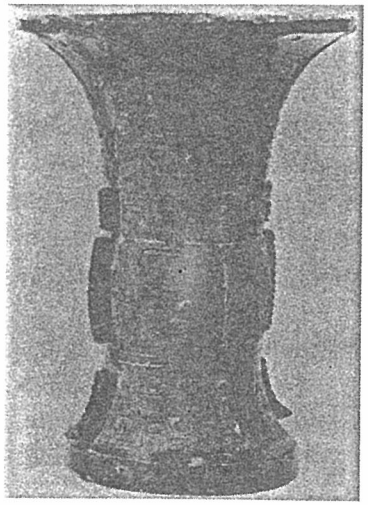


圖66 三層鴟觚形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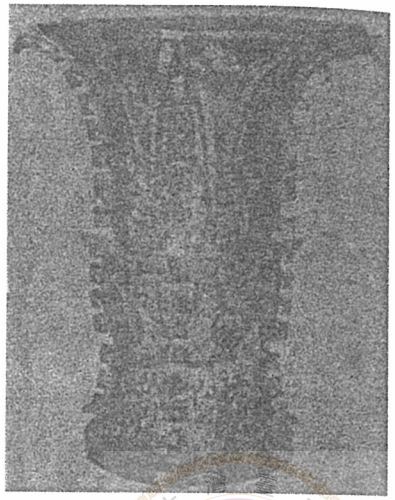


圖67 三層鴟觚形尊



圖68 宋代銅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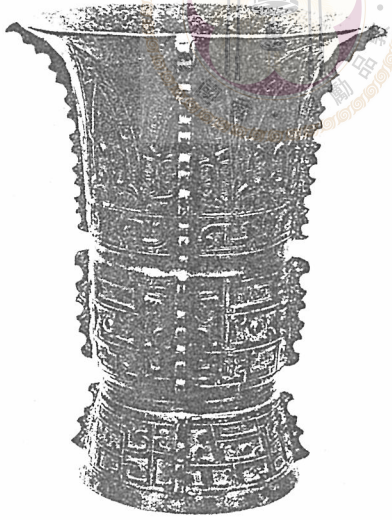


圖69 十二世紀早期銅尊，台北故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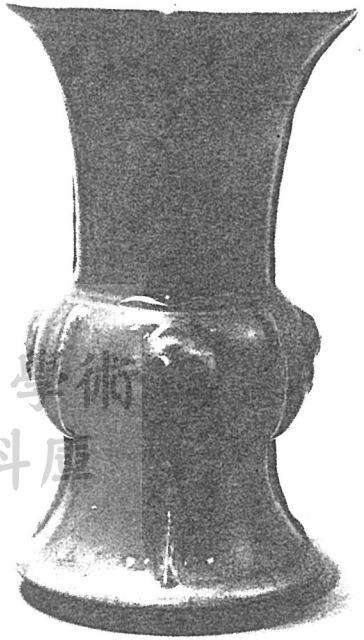


圖70 青瓷出脊尊，穎川美術館



圖71 新安沉船出土銅觚



圖72 元代青花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73 景泰銘出脊尊，
San Francisco Asia Museum



圖74 正德銘出脊尊



圖75 嘉靖銘出脊尊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圖76 萬曆銘出脊尊



圖77 四川元墓出土銅壺



圖78 日用型鈞釉小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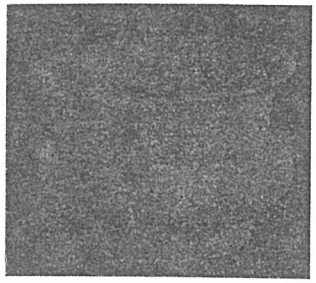


圖79 南宋窖藏出土青瓷盂



圖80　新安沉船出土青瓷盂



圖81 宣德銘青花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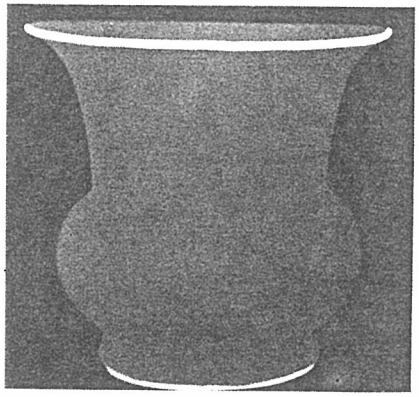


圖82 嘉靖銘陳設器



圖83 萬曆定陵出土"尊"



圖85 鈞窯仰鐘式花盆，台北故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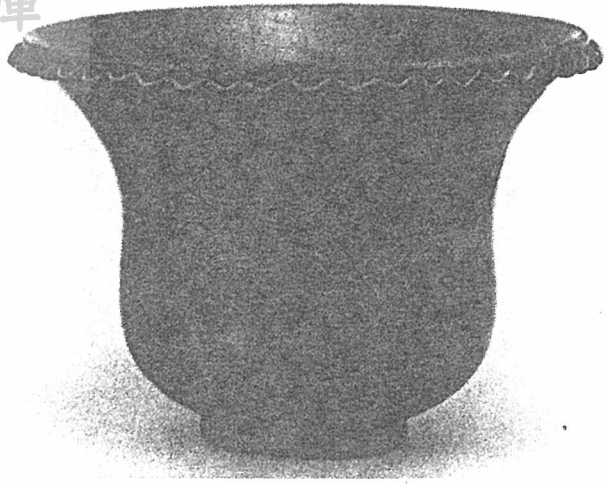


圖84 新安沉船出土青瓷花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86 正德銘法華花盆



圖87 長沙窯南宋鼓釘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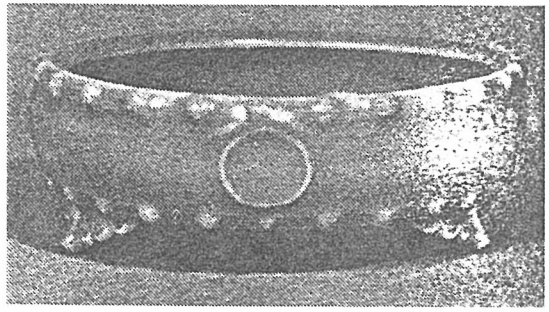


圖88 龍泉鼓釘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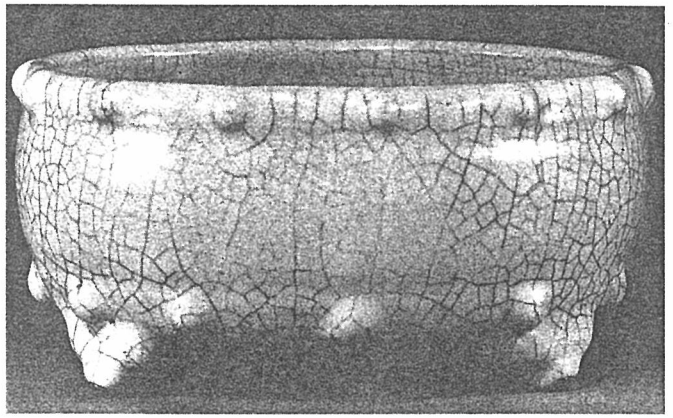


圖89 「哥窯」鼓釘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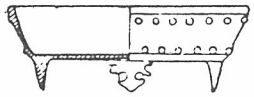


圖90 水吉建窯元初地層出土鼓釘洗



圖91 哥窯香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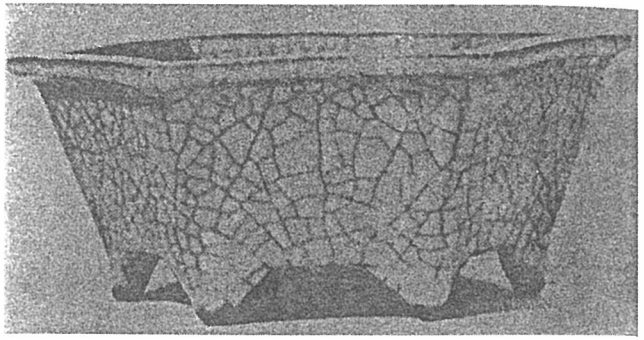


圖92 哥窯六方形香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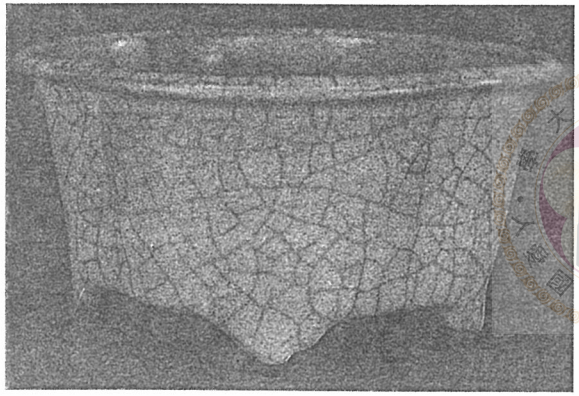


圖93 哥窯海棠式香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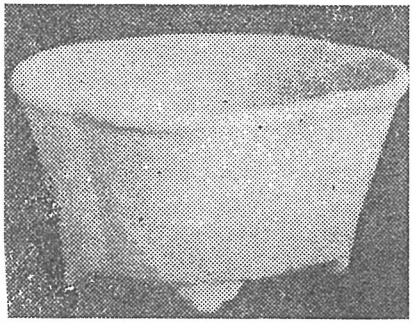


圖94 南宋墓(1205)出土青白瓷香爐

表一 傳世鈞窯器底部漢文數字與尺寸一覽表

編號	器形	高度(公分)	口徑(公分)	足徑(公分)	漢字號碼	備註	釉色	收藏地
1	出脊尊	20.00	14.60	10.70	十刻	足底塗褚黑色護胎汁	天青色	台北故宮
★2	出脊尊	18.40	15.60	12.50	十刻	足底塗淡褚色薄汁	天青色	台北故宮
3	出脊尊	19.50	14.40	11.40	十刻	足底有月白釉，下壁為芝麻醬釉	月白色	台北故宮
4	出脊尊	19.80	14.50	11.20	?	足底有月白釉，下壁為芝麻醬釉	月白色	台北故宮
5	出脊尊	20.50	?	?	九刻		月白色	Sotheby
6	出脊尊	20.3(蓋)	13.60	13.40	八，似後刻	底內上月白色厚釉，口部燒破紮補，並加鈐銅口	藍紫色	台北故宮
7	出脊尊	22.00	16.60	12.50	八刻		月白色	台北故宮
8	出脊尊	24.70	19.20	14.40	六，似後刻	底內上月白色釉	藍紫色	台北故宮
9	出脊尊	24.90	20.50	14.40	六刻		月白色	台北故宮
10	出脊尊	24.60	?	?	六刻	底內上月白色釉，下壁為芝麻醬釉，底部頂端有一突出	月白色	台北故宮
11	出脊尊	26.70	22.00	16.90	五刻		月白色	台北故宮
12	出脊尊	26.10	22.10	16.70	五刻	足底上褐色護胎汁	月白色	上海博物館
13	出脊尊	29.90	23.00	17.90	四刻		月白色	台北故宮
14	出脊尊	32.60	26.00	21.00	三		月白色	北京故宮
■■■	■■■■■	■■■■	■■■■	■■■■	■■■	■■■■■■■■■■	■■■■	■■■■■■■■
15	渣斗式花盆	17.30	19.10	10.90	七刻	底、足均塗褐色汁	藍紫色	台北故宮
16	渣斗式花盆	17.50	19.00	11.10	七刻		天青色	台北故宮
17	渣斗式花盆	17.10	19.20	10.90	七刻		器內天青、器外藍紫相間	台北故宮
18	渣斗式花盆	17.50	19.10	11.00	七刻		葡萄紫	台北故宮
19	渣斗式花盆	17.80			七刻	底部上透明釉	葡萄紫	台北故宮
20	渣斗式花盆	18.20	20.00	11.80	六刻	底刻:「建福宮」、「敬勝齋樓下用」。底部塗褐汁，刻"六"後再上釉燒。施釉不均勻，釉厚處呈天藍色，釉薄處稍帶乳濁	內外皆月白色	台北故宮
★21	渣斗式花盆	18.40	20.10	12.00	六刻		玫瑰紫	北京故宮
22	渣斗式花盆	19.50	21.20	12.00	五刻		玫瑰紫，腹部多綠斑點	台北故宮
23	渣斗式花盆	19.50	21.30	12.10	五刻	底刻:「養心殿」、「東暖閣下用」	深紫與藍混合	台北故宮
24	渣斗式花盆	19.70	21.30	12.30	五刻		內部純藍，外部藍紫相間	台北故宮
25	渣斗式花盆	19.70	21.60	12.20	五	盆底露胎處呈芝麻醬色	深淺紫色相間	台北故宮
26	渣斗式花盆	21.00	22.50	12.60	四刻		月白與天青相間	台北故宮
27	渣斗式花盆	20.96	22.22	?	四刻	底上褐釉	月白釉	前藏
28	渣斗式花盆	23.30	23.60	13.80	三刻		內部純青，外部藍紫相間	台北故宮
29	渣斗式花盆	24.30	25.00	14.60	二刻	底塗褐汁、圈足露灰胎	天藍	台北故宮
30	渣斗式花盆	24.40	25.10	15.10	?	足底塗紫黑色汁	外月白，內部多黃點	台北故宮
31	渣斗式花盆	24.50	?	?	無	底部上釉，釉厚處呈天藍色，釉薄處透明	純月白色	台北故宮
★32	渣斗式花盆	21.50	23.00	13.50	二刻		月白色	北京故宮
33	渣斗式花盆	25.80	26.80	15.70	一刻	底部不均勻地上褐汁	內天藍，外深紫窯	台北故宮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周	
34	漬斗式花盆	26.10	27.00	15.10	一刻		天藍窯變	台北故宮
35	漬斗式花盆	25.60	26.4	16.1	一		紫紅窯變	Fogg Art Museum
36	漬斗式花盆	25.60	?	?	一刻		天藍色	Freer Gallery
■■■	■■■■■■	■■■■■	■■■■■	■■■■■	■■■■■	■■■■■■■■■■	■■■■■■■	■■■■■■■
37	仰鐘式花盆	14.70	19.70	9.50	九刻		內部純藍，外壁藍紫相間	台北故宮
38	仰鐘式花盆	?	19.20	?	九刻	底部上透明釉	內部天藍，外壁深紫	台北故宮
39	仰鐘式花盆	14.80	19.50	9.70	九刻		藍紫色	台北故宮
40	仰鐘式花盆	14.90	19.70	9.60	九刻		玫瑰紫	台北故宮
41	仰鐘式花盆	16.10	21.20	10.50	八刻	口沿鈞銅邊	藍紫色	台北故宮
42	仰鐘式花盆	17.00	23.00	12.00	六		藍紫紅相間	北京故宮
★43	仰鐘式花盆	22.50	28.60	15.10	無	足底塗紫黑色汁	玫瑰紫	台北故宮
44	仰鐘式花盆	23.50	28.4 - 31.9	16.10	一刻		玫瑰紫	台北故宮
45	仰鐘式花盆	22.30	?	?	一刻	底部上釉，釉厚處呈天藍色，釉薄處透明	內部純藍，外壁藍紫相間	台北故宮
■■■	■■■■■■	■■■■■	■■■■■	■■■■■	■■■■■	■■■■■■■■■■	■■■■■■■	■■■■■■■
46	弦釘式洗	14.50			釉下刻十	底部支釘痕十四個，並上橄欖色厚釉。	天藍	Macdonald Collection
★47	弦釘式洗	6.30	16.40	12.40	八刻			台北故宮
48	弦釘式洗	6.80	17.20	12.50	八刻	口下乳釘現存十三枚，底邊十五枚。底部支釘痕十六個。	內青外紫紅	台北故宮
49	弦釘式洗	?	17.40	?	八			東京博物館
50	弦釘式洗	6.80	17.50	12.60	八		天藍、深紫色	北京故宮
51	弦釘式洗	6.80	17.50	12.60	八刻	口下乳釘十六枚，底邊十五枚。底部支釘痕十六個。	內部天藍，外部深紫	台北故宮
52	弦釘式洗	?	17.80	?	八		內天藍外紫	MOA 美術館
53	弦釘式洗	6.98	18.80	?	七刻			Eumorfopolous
54	弦釘式洗	6.90	20.00	?	七刻			Eumorfopoulos
★55	弦釘式洗	?	23	?	七			上海博物館
56	弦釘式洗	?	20.30	?	六		內天藍外紅	世界陶瓷全集
★57	弦釘式洗	8.10	20.80	15.10	五刻	口下乳釘十八枚、底邊十五枚。底部支釘痕二十個。	內部藍紫外壁深紫灰	台北故宮
★58	弦釘式洗	9.80	23.60	16.80	?	口下乳釘二十一枚、底邊十六枚底部支釘痕十五個。		台北故宮
★59	弦釘式洗	10.20	23.30	16.70	底、足各刻五	口下乳釘二十一枚、底邊十六枚。底部支釘痕十五個。	天青色，近口處呈紫色	台北故宮
★60	弦釘式洗	?	16.20	?	四刻	底部支釘痕十七個。		台北故宮
61	弦釘式洗	?	19.70	?	四刻	底部支釘痕十四個，上褐色釉。	內部天青，外部紫色	Christie's, H. K., 1991
62	弦釘式洗	7.50	20.00	14.40	四刻	口下乳釘十九枚、底邊十八枚。底部支釘痕十七個。	內部天青，外部紫色	台北故宮
★63	弦釘式洗	7.80	21.20	16.00	四刻	口下乳釘十六枚、底邊十五枚。底部支釘痕十六個。	內部天藍，外部深紫	台北故宮
64	弦釘式洗	?	21.40	?	四			東京博物館
★65	弦釘式洗	9.50	24.00	?	四刻			Baur Collection
66	弦釘式洗	?	20.50	?	三刻			Christie's, H. K., 1992
67	弦釘式洗	?	20.90	?	三刻			The Koger Collection
68	弦釘式洗	7.90	21.00	15.00	三刻	口下乳釘十九枚、底邊十五枚。底部支釘痕十五個。	內部藍色暗澹，外部深紫	台北故宮
69	弦釘式洗	?	21.00	?	三刻	底部支釘痕十四個，並上青釉。	天藍色	Macdonald Collection
70	弦釘式洗	?	21.00	?	三刻			Sotheby's H. K., 1994
71	弦釘式洗	8.50	22.20	16.00	二刻	口下乳釘二十一枚、底邊十八枚。底部支釘痕十六個。	內部天藍，外部葡萄紫窯變	台北故宮
72	弦釘式洗	8.70	22.50	16.00	二		月白、紫色	北京故宮
★73	弦釘式洗	9.60	24.20	17.50	足裡刻二，底刻三	口下乳釘二十枚、底邊十七枚。底部支釘痕二十九個。	內部深藍，外部藍紫窯變	台北故宮
★74	弦釘式洗	9.00	24.50	?	二			松岡美術館
★75	弦釘式洗	?	25.10	?	足裡刻二，底刻二			From W.B.R. Neave Hill, CHINESE CERAMICS
★76	弦釘式洗	8.00	22.00	?	一	底部支釘痕二十一個。		Baur Collection
77	弦釘式洗	9.40	23.50	19.50	一		玫瑰紫	北京故宮
78	弦釘式洗	9.20	23.80	17.20	一刻	底部支釘痕十八個	內部天藍帶紫，外部全紫	台北故宮
79	弦釘式洗	8.89	23.88	?	一刻			Eumorfopolous
80	弦釘式洗	9.10	23.90	?	一刻			Eumorfopolous
81	弦釘式洗	8.76	24.13	?	一刻			Eumorfopolous
82	弦釘式洗	9.20	24.30	16.00	一		月白色	北京故宮
★83	弦釘式洗	11.50	25.20	16.50	無		天藍色	北京故宮
84	弦釘式洗	9.40	25.40	18.50	一刻	底刻「瀛台」、「香房殿用」口下乳釘二十二枚、底邊十八枚。底部支釘痕十九個。	內部月白，外部月白帶灰	台北故宮
85	弦釘式洗	9.90	25.50	18.30	一刻	口下乳釘二十一枚、底邊十八枚。底部支釘痕二十個，露灰色胎	天藍色深淺不均	台北故宮
★86	弦釘式洗	12.00	25.60	18.90	足刻一	口下乳釘二十三枚、底邊十九枚。底部支釘痕二十九個，底刻「養心殿」、「長春書屋用」	天青色內深外淺	台北故宮
87	弦釘式洗	9.52	25.65	?	一刻			Eumorfopolous
★88	弦釘式洗	10.50	26.30	?	一刻	底部支釘痕三十餘個，大而密，支釘圈內上厚釉，顏色與器身同，漢字一刻在底部釉上，是燒後刻	月白色	北京故宮
89	弦釘式洗	9.60	26.50	17.00	一		月白色	北京故宮
★90	弦釘式洗	10.40	27.00	19.20	無	口下乳釘二十三枚、底邊二十枚。底部支釘痕三十餘個混亂不清。	內部青色略淺，外部葡萄紫色不均	台北故宮
★91	弦釘式洗	9.90	27.30	?	大、一刻			Eumorfopolous
★92	弦釘式洗	?	27.30	?	-	根據thermolum-inescence test，時代在至16世紀之間	內部天藍外部紫色	Sotheby's London, 1994
★93	弦釘式洗	?	30.20	?	一刻	底部支釘二十三枚。	天藍色。支釘與漢字刻處呈灰白色	The Tsui Museum of Art

表一續

表一續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94	長方形花盆	14.60	20.3	?	十刻	底部上揭釉		Eumorfopolous
95	長方形花盆	14.80	20.3x 16.4	13.1x 9.5	十刻	底部有支釘痕十四枚，露深灰色胎。並刻有「建福宮」、「凝暉堂用」	內天青外深紫窯變	台北故宮
96	長方形花盆	15.00	20x 16.5	13.4x 10	十刻	底塗揭汁，足圈露灰胎	玫瑰紫	北京故宮
97	長方形花盆	15.20	20.3x 16.4	13x 9.5	十刻	底塗揭汁，足圈露灰胎	內天藍外深紫	台北故宮
98	長方形承盤	?	19.00	?	九刻	底部有十九個支釘痕	天藍色	Sotheby's London, 1995
99	六方形花盆	?	26	?	?			CHRISTIE'S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1984
100	六方形承盤	6.30	?	?	?			Seattle Art Museum
★101	六方形承盤	13.00	22.8X 15.2	13.5X 9.2	八		天藍窯變	北京故宮
102	六方形承盤	6.30	13.6x 20.5	14.9x 10	七刻號碼被磨損	底部有十八個支釘痕，露灰色胎，並刻「養心殿」、「明窗用」	內青外紫	台北故宮
103	六方形承盤	6.30	13.6x 20.5	14.9x 10	七刻號碼被磨損	底部有十八個支釘痕，露灰色胎，並刻「養心殿」、「明窗用」	內青外紫	台北故宮
104	海棠式花盆	14.30	23.40	?	?			北京故宮
105	海棠式花盆	14.60	24.50	?	?			中國歷史博物館
106	海棠式花盆	14.70	23.3x 18.6	8.00	四		月白帶玫瑰紫	北京故宮
107	海棠式承盤	5.00	17.4x 13.8	?	八		內藍外紫紅	北京故宮
★108	海棠式承盤	4.70	17.50	?	七	底有支釘十五枚	內藍外紫紅	上海博物館
★109	海棠式承盤	6.90	20.1x 15.4	14.9x 10.6	底刻九足刻六	底有支釘二十四枚	內藍外紫紅	台北故宮
110	海棠式承盤	6.60	19.68	?	三刻		藍紫色	Eumorfopolous
111	海棠式承盤	7.87	22.60	?	一刻		藍紫色	Eumorfopolous
112	海棠式承盤	8.00	21.4x 17.6	16.5x 11.8	一刻	底有支釘十十九枚露灰色胎，並刻「重華宮」、露「漱芳齋用」	內天藍外藍紫色	台北故宮
113	菱花式花盆	14.00	20.30	10.10	十刻	六瓣菱花形	內天藍外藍紫色	台北故宮
114	菱花式花盆	14.20	20.50	10.20	十刻	六瓣菱花形	內天藍外藍紫色	台北故宮
115	菱花式花盆	14.30	21.40	?	九印	六瓣菱花形		Freer Gallery
116	菱花式花盆	16.50	22.80	11.90	七刻	六瓣菱花形底刻	玫瑰紫「養心殿」、「隨安室用」	台北故宮
117	菱花式花盆	17.10	24.80	11.40	五刻	六瓣菱花形	深紫	台北故宮

表一續

118	菱花式花盆	18.20	26.70	13.30	三		天藍、玫瑰紫	北京故宮
119	菱花式花盆	19.68	?	?	一刻	六瓣菱花形	藍紫紅色	Chicago Collections
★120	菱花式承盤（四瓣菱花形）	9.00	19.00	8.30	足刻十		月白加玫瑰紫	北京故宮
121	菱花式承盤【以下皆六瓣菱花形）	6.20	19.00	11.00	底刻十		玫瑰紫	北京故宮
122	菱花式承盤	5.70	19.00	?	十刻		玫瑰紫	北京故宮
123	菱花式承盤	?	19.10	?	十刻			Boston Museum
124	菱花式承盤	?	19.30	?	十			世界陶瓷全集十三頁290
★125	菱花式承盤	5.90	19.70	?	九印			東京博物館
126	菱花式承盤	6.10	19.70	?	九			Sotheby's London, 1980
127	菱花式承盤	6.98	21.08	?	七刻			Eumorfopolous
128	菱花式承盤	?	22.54	?	四刻			Shire Collection
129	菱花式承盤	7.20	22.20	14.00	四刻	底部有十四個支釘痕	月白色	台北故宮
130	菱花式承盤	7.30	23.00	13.90	三刻	底部有十四個支釘痕，露灰胎色,底塗揭色護胎汁	天青色	台北故宮
131	菱花式承盤	7.30	22.50	13.90	三刻	底部有十七個支釘痕	內天青外深紫	台北故宮
132	菱花式承盤	7.40	22.70	13.80	三刻	底部有十八個支釘痕	內天青外淺紫	台北故宮
★133	菱花式承盤	7.30	23.00	13.90	二刻	底部有十八個支釘痕	內天青外深紫	台北故宮
134	菱花式承盤	7.62	23.87	?	二刻			Eumorfopolous
★135	菱花式承盤	9.40	25.90	17.00	底刻一足刻四	底部有三十二個支釘痕	內天青外紫	台北故宮
136	葵花式花盆（六瓣）	14.00	19.60	?	十刻		藍紫色	台北故宮
137	葵花式花盆	15.80	22.80	11.50	七		玫瑰紫	北京故宮
138	葵花式花盆	15.80	22.80	11.50	七		天藍帶玫瑰紫	北京故宮
139	葵花式花盆	16.10	22.70	11.50	七刻	底上釉釉厚處呈天藍色	內青外紫	台北故宮
140	葵花式花盆	16.80	23.20	12.30	六刻		藍紫相間	台北故宮
141	葵花式花盆	17.00	24.80	12.40	刻五	底部上透明揭釉	天藍	台北故宮
142	葵花式花盆	17.78	26.41	?	四刻			Eumorfopolous
143	葵花式花盆	18.10	25.50	11.40	四刻		內青外紫	台北故宮
144	葵花式花盆	18.80	26.40	13.00	三刻		內青外紫	台北故宮
145	葵花式花盆	18.80	?	?	三刻			Eumorfopolous
146	葵花式花盆	20.60	28.20	14.10	一刻		天青	台北故宮
147	葵花式承盤（以下皆六瓣葵花形）	6.00	19.00	8.00	十		玫瑰紫	北京故宮
148	葵花式承盤	6.20	18.60	11.00	十刻	底部有十三個支釘痕，並刻「瀛台」、虛舟用	內青外紫	台北故宮
★149	葵花式承盤	5.84	20.32	?	九			Eumorfopolous
150	葵花式承盤	6.40	19.20	10.90	九刻	釘底部有十二個支釘痕	天青色	台北故宮

表一續

臺灣大學 期刊資料庫

151	葵花式承盤	6.20	19.90	11.10	八刻	底部有十四個支釘痕	內青外玫瑰紫	台北故宮
152	葵花式承盤	6.30	20.30	12.00	七刻	底部有十三個支釘痕	天青	台北故宮
153	葵花式承盤	6.50	20.30	12.50	七刻	底部有十五個支釘痕	紫色	台北故宮
★154	葵花式承盤	6.60	21.59	?	七刻			Eumorfopolous
155	葵花式承盤	6.60	21.40	13.00	六刻	底部有十八個支釘痕	內青外紫	台北故宮
156	葵花式承盤	?	22.00	?	六刻			Christie's H. K., 1992
157	葵花式承盤	6.90	22.30	?	六印			Freer Gallery
158	葵花式承盤	?	22.50	?	五刻	底部有十六個支釘痕		Macdonald Collection
159	葵花式承盤	7.7	22.40	13.90	四刻	底部有十七個支釘痕，並刻「重華宮」、「芝蘭室用」	內青外紫	台北故宮
160	葵花式承盤	7.50	22.70	13.90	三刻	底部有十八個支釘痕	內青外紫	台北故宮
161	葵花式承盤	7.40	23.20	13.60	三刻	底部有二十個支釘痕	內青外玫瑰紫	台北故宮
★162	葵花式承盤	7.50	20.50	14.10	底釉磨損一片加刻一	釘底部有二十一個支釘痕，露灰色胎	天藍	台北故宮
■■■	■■■■■	■■■■	■■■■	■■■■■	■■■■	■■■■■■■■■■	■■■■■■	■■■■■■■■■
★163	葵花式承盤（十二瓣）	8.10	21.60	13.70	底刻七，足刻九		月白加玫瑰紫	北京故宮

表一續

表一資料出處

台北故宮：

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故宮瓷器錄：第一輯--宋元》（台中：國立故宮博物院，1961），上編，頁9-34；下編，頁2。

北京故宮：

王莉英，〈談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官鈞"瓷器〉，收在《河南鈞瓷汝瓷與三彩》（北京：紫禁城，1985），頁37-38。

Eumorfopolous：

R. L. Hobson, *THE GEORGE EUMORFOPOLOU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REAN AND PERSIAN POTTERY AND PORCELAIN , VOL. 3, FROM TANG TO MING: CHUN, TING AND ZUCHOU WARES* (London: Earnest Benn. Ltd., 1925), plate C1, C2, C3, C6, C7 ,C8, C9, C11-C17, C19, C20, C22, C23.

5 Sotheby's, *FINE CHINESE CERAMICS, WORKS OF ART, JADE CARVINGS AND JADEITE JEWELRY, HONG KONG, Oct, 1993* (H.K.: Sotheby's, 1993), plate 16.

12 汪慶正、范季融，《胡惠春先生、王華云女士捐贈瓷器精選》（上海：上海博物館，1989），圖9。

35 三上次男編，《世界陶瓷全集：元》（東京：小學館，1981），圖版293。

36 Kodansha, *ORIENTAL CERAMICS: FREER GALLERY* (Tokyo: Kodansha, 1981), plate 13.

46 Ireneus Laszlo Legeza, *A DESCRIPTIVE AND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MALCOLM MACDONALD COLLECTION OF CHINESE CERAM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late XXVII.

49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館藏目錄：中國陶瓷篇I》（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88），圖484。

52 松岡美術館，《東洋陶磁名品圖錄》（東京：松岡美術館，1991），plate 147。

55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陶瓷》，中（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圖148。

61 Christie's, *FINE CHINESE CERAMICS, JADES AND WORKS OF ART: HONG KONG, MARCH, 18/19, 1991* (London： Christie's, 1991), plate 505.

64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館藏目錄：中國陶瓷篇I》（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88），圖485。

65 John Ayers, *BAUR COLLECTION: CHINESE CERAMICS* (Geneva: Baur, 1968), vol. I, plate A47.

66 Christie's, *FINE CERAMICS, JADEITE, JEWELRY AND JADE CARVINGS: HONG KONG, SEP. 29, 1992* (H.K.: Christie's, 1992).

67 John Ayers, *CHINESE CERAMICS：THE KOGER COLLECTION* (London: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Ltd., 1985), plate 28.

69 Ireneus Laszlo Legeza, *A DESCRIPTIVE AND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ALCOLM MACDONALD COLLECTION OF CHINESE CERAM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late 8.

70 Sotheby's, *FINE CHINESE CERAMICS, WORKS OF ART, JADE CARVINGS AND JADEITE JEWELRY: HONG KONG, MAY 4, 1994* (H.K.: Sotheby's, 1994), plate 7.

74 松岡美術館，《東洋陶磁名品圖錄》(東京：松岡美術館，1991)。

75 W. B. R. Neave-Hill, *CHINESE CERAMICS* (N.Y.: St. Martin's Press, 1976), plate 73.

76 John Ayers, *BAUR COLLECTION: CHINESE CERAMICS* (Geneva: Baur, 1968), vol. I, plate A48.

88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中國陶瓷全集：鈞窯》(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圖版15。

92 Sotheby's, *FINE CHINESE CERAMICS, JADE AND WORKS OF ART* (London: Sotheby's, 1994), plate 145.

93 Tsui Museum, *THE TSUI MUSEUM OF ART* (H.K.: Tsui Museum of Art, 1991), plate 380.

98 Sotheby's, *A PRIVA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LONDON, DECEMBER, 1995* (London: Sotheby's, 1995), plate 367.

99 Anthony Du Boulay, *CHRISTIE'S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Oxford: Christie's, 1984), plate 3.

10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海外遺珍》(台北：故宮博物院，1992)，圖97。

105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中國陶瓷全集：鈞窯》(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圖版19。

108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中國陶瓷全集：鈞窯》(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圖版29。

115 Kodansha, *ORIENTAL CERAMICS: FREER GALLERY* (Tokyo: Kodansha, 1981), plate 54。

119 Betty Iverson Monroe, *CHINESE CERAMICS FROM CHICAGO COLLECTIONS* (Chicago: North Western University, Mare & Leigh Block Gallery, 1982), plate 28.

123 Kodansha, *ORIENTAL CERAMICS: BOSTON MUSEUM* (Tokyo: Kodansha, 1980), plate 212.

124 三上次男編，《世界陶瓷全集：元》(東京：小學館，1981)，圖290。

125 Kodansha, *ORIENTAL CERAMICS: TOKYO NATIONAL MUSEUM* (Tokyo: Kodansha, 1982), plate 88.

126 Sotheby's, *THE EDWARD T. CHOW COLLECTION, PART TWO: EARLY CHINESE CERAMICS AND ANCIENT BRONZES* (London: Sotheby's, 1980), plate 267.

128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Sung Dynasty Wares: Chun & Brown Glazes,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Held by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27 (1951-53), plate 41.

156 Christie's, *FINE CHINESE CERAMICS, JADEITE, JEWELRY AND JADE CARVINGS: HONG KONG, 1992* (H.K.: Christie's, 1992), plate 454.

158 Ireneus Laszlo Legeza, *A DESCRIPTIVE AND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MALCOLM MACDONALD COLLECTION OF CHINESE CERAM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late XXVII-80.

圖版文獻出處

1 趙青雲，〈河南省禹縣鈞台窯的發掘〉，《文物》，1975年，6期，頁60，圖10之3。

2 趙青雲，〈河南省禹縣鈞台窯的發掘〉，《文物》，1975年，6期，頁59，圖6。

3 筆者繪。

4 陳秋美攝。

5 趙青雲，〈河南省禹縣鈞台窯的發掘〉，《文物》，1975年，6期，頁58，圖3下。

6 W. David Kingery & Pamela B. Vandiver, *CERAMIC MASTERPIECES* (N.Y.: The Free Press, 1986), p. 98, figure 4-2.

7 趙青雲，〈河南省禹縣鈞台窯的發掘〉，《文物》，1975年，6期，頁59，圖2。

8 趙青雲，〈河南省禹縣鈞台窯的發掘〉，《文物》，1975年，6期，頁59，圖3上。

9 筆者攝。

10 筆者攝。

11 筆者攝。

12 劉振群，〈窯爐的改進和我國古陶瓷發展的關系〉，收在中國矽酸鹽學會編，《中國古陶瓷論文集》(北京：文物，1982)，頁163，圖2。

13 劉振群，〈窯爐的改進和我國古陶瓷發展的關系〉，收在中國矽酸鹽學會編，《中國古陶瓷論文集》(北京：文物，1982)，頁163，圖1。

14 禚振西、盧建國，〈耀州窯遺址調查發掘新收獲〉，《考古與文物》，1980年，2期，頁58，圖7。

15 禚振西、盧建國，〈耀州窯遺址調查發掘新收獲〉，《考古與文物》，1980年，2期，頁58，圖7。

16 熊海堂，《東亞窯業技術發展與交流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73，圖 3-3-17。

17 杜保仁，〈耀州窯的窯爐和燒成技術〉，《文物》，1987年，3期，頁33，圖3。

18 咸陽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旬邑安仁古瓷窯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0年，3期，頁42，圖5。

19 北大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磁縣觀台磁州窯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4期，頁17，圖38。

20 重慶市博物館、南岸區文物館，〈四川重慶涂山鋸木灣宋代瓷窯發掘簡報〉，《考古》，1991年，3期，頁229，圖2。

21 山東淄博陶瓷史編寫組，〈山東淄博市淄川區磁村古窯址試掘簡報〉，《文物》，1978年，6期，頁47，圖2之2。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22 劉新園、白焜，〈景德鎮湖田窯考察紀要〉，《文物》，1980年，11期，頁42，圖9。
23 筆者攝。
24 淄博市博物館，〈山東淄博地區窯址的調查與試掘〉，《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1984），頁361，圖3。
25 李輝柄，《宋代官窯瓷器》（北京：紫禁城，1992），頁51，圖27。
26 長沙市文物工作隊，〈長沙發現宋代銅錢和銅器窖藏〉，《文物資料叢刊》，10期（1987），頁190-191，圖1、2。
27 初尚齡，〈吉金所見錄〉，收在桑之行等編，《説錢》（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頁785。
28 筆者攝。
29 筆者攝。
30 筆者攝。
31 中國陶瓷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陶瓷全集：鈞窯》（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圖72。
32 筆者攝。
33 劉玉生、馬儷鵬，〈河南省方城縣出土一批宋代瓷器〉，《文物》，1983年，3期，頁93，圖5左。
3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葛縣石固發現窖藏鈞瓷〉，《中原文物》，1983年，4期，圖版8之1。
35 筆者攝。
36 大同市博物館，〈大同元代壁畫墓〉，《文物季刊》，1993年，2期，頁19，圖5之2。
37 筆者攝。
38 筆者攝。
39 筆者攝。
40 John Ayers, *BAUR COLLECTION: CHINES CERAMICS* (Geneva: Baur, 1968), vol. I, plate A48.
41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中國陶瓷全集：鈞窯》（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圖15。
42 筆者攝。
43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陶瓷》，中（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圖146。
44 W. B. R. Neave-Hill, *CHINESE CERAMICS* (N.Y.: St. Martin's Press, 1976), plate 73.
45 三上次男編，《世界陶磁全集：元》（東京：小學館，1981），圖289。
46 Sotheby's, *FINE CHINESE CERAMICS, WORKS OF ART, JADE CARVINGS AND JADEITE JEWELRY: HONG KONG, OCT, 1993* (Hong Kong: Sotheby's, 1993), plate 15.

47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瓷圖錄（四）：汝窯、官窯、鈞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圖44。
48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瓷圖錄（四）：汝窯、官窯、鈞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圖45。
49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陶瓷》，中（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圖146。
50 W. B. R. Neave-Hill, *CHINESE CERAMICS* (N. Y.: St. Martin's Press, 1976), plate 73.
51 汪慶正、范季融，《胡惠春先生、王華云女士捐贈瓷器精選》（上海：上海博物館，1989），圖9。
52 汪慶正、范季融，《胡惠春先生、王華云女士捐贈瓷器精選》（上海：上海博物館，1989），圖9。
5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瓷圖錄（四）：汝窯、官窯、鈞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圖47。
5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瓷圖錄（四）：汝窯、官窯、鈞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圖50。
5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瓷圖錄（四）：汝窯、官窯、鈞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圖48。
5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瓷圖錄（四）：汝窯、官窯、鈞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圖47。
57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瓷圖錄（四）：汝窯、官窯、鈞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圖50。
58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瓷圖錄（四）：汝窯、官窯、鈞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圖48。
60 出光美術館編，《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錄：中國陶瓷》（東京：出光美術館，1987），圖100。
61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中國陶瓷全集：鈞窯》（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圖29。
62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瓷圖錄（四）：汝窯、官窯、鈞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圖1。
6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瓷圖錄（四）：汝窯、官窯、鈞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圖1。
64 林巳奈夫，〈所謂饕餮紋表現的是什麼〉，收在樋口隆康編，《中國考古學研究論文集》（東京：株式會社東方書店，1990），頁139，圖4。
65 林巳奈夫，〈所謂饕餮紋表現的是什麼〉，收在樋口隆康編，《中國考古學研究論文集》（東京：株式會社東方書店，1990），頁139，圖5。
66 林巳奈夫，〈所謂饕餮紋表現的是什麼〉，收在樋口隆康編，《中國考古學研究論文集》（東京：株式會社東方書店，1990），頁139，圖6。
67 樋口隆康，〈西周銅器之研究〉，收在樋口隆康編，《中國考古學研究論文集》

臺灣大學藝術 期刊資料庫

（東京：株式會社東方書店，1990），頁55，圖6-4。

68 和泉久保惣紀念美術館編，《花の器》（和泉市：和泉久保惣紀念美術館，1994），plate 5。

69 William Watson, "On Some Categories of Archaism in Chinese Bronzes," ARS ORIENTALIS, vol. IX (1973), plate I, figure 1.

70 大阪市立美術館編，《宋元の美術》（東京：平凡社，1980），圖89。

71 Marla M. Zainie, "The Sinan Shipwreck and Early Muromachi Art Collections," *ORIENTAL ART*,vol. 25, no. 1 (1979-1980), figure 21.

72 Feng Ping Shan Museum, *JINGDEZHEN WARES: THE YUAN EVOLUTION* (H.K.: Oriental Society of Hong Kong, 1984), plate 136.

73 京都國立博物館，《サンフランシスコ一一美術館所藏東洋美術》（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1995），圖62。

74 耿寶昌，《明清瓷器鑑定》（北京：紫禁城，1993），圖211。

75 藤岡了一、長谷部樂爾編，《世界陶磁全集：明》（東京：小學館，1976），圖193。

76 藤岡了一、長谷部樂爾編，《世界陶磁全集：明》（東京：小學館，1976），圖210。

77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簡陽東溪園藝場元墓〉，《文物》，1987年，2期，頁80，圖35之12。

79 丁祖春，〈四川省什邡縣出土的宋代瓷器〉，《文物》，1978年，3期，頁94，圖8。

80 《新安海底遺物綜合編》（漢城：文化公報部、文物財管理局，1988），頁423，圖13。

8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明瓷圖錄：洪武窯、永樂窯、宣德窯》（台北：故宮，1977），圖46。

8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藏瓷：明單色釉瓷二》（台北：故宮博物院，1963），圖7。

83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定陵》，下（北京：文物，1990），圖163。

84 《新安海底引揚げ文物》（東京：中日新聞社，1983）頁66，圖40。

8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瓷圖錄（四）：汝窯、官窯、鈞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圖59。

86 Valare Reynolds, *2000 YEARS OF CHINESE CERAMIC: THE NEWARK MUSEUM COLLECTION* (Newark: Newark Museum Association, 1978), plate 34.

87 黃綱正，〈長沙銅官窯頭沖宋代窯址調查〉，收在文物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1984），圖版玖之6。

88 Margaret Medley,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CELADON WARES* (Londo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frican Studies, 1977), plate 69.

89 Sotheby's, *FINE CHINESE CERAMICS, WORKDS OF ART AND JADE CARVINGS: HONG KNOG, MAY2, 1995* (Hong Kong: Sotheby's, 1995). plate 8.

90 福建省博物館編，〈福建建陽縣水吉建窯遺址1991-1992年度發掘簡報〉，《考古》，1995年，2期，頁153，圖3之4。

9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藏瓷：南宋官窯—修內司官窯（一）》，下（台北：故宮，1962），圖30。

92 大阪市立美術館，《中國美術展シリーズ：宋元の美術》（東京：朝日新聞社，1978），圖1-68。

93 李輝柄，《宋代官窯瓷器》（北京：紫禁城，1992），彩圖18。

94 黃頤壽，〈江西清江出土的南宋青白瓷〉，《考古》，1989年，7 期，頁671，圖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